ZHONGGONG HEFEI SHIWEI DANGXIAO XUEBAO

ISSN 1674-5000
CN 34-1249/Z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王玉堂　不断提高战略思维能力
孙　浩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探索
课题组　关于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若干思考
吴义达　安徽省政府专项债券问题研究

2022年第2期（总第94期）
第21卷　双月刊　3月30日出版

征稿启事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是中共合肥市委主管，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合肥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本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关注改革发展前沿问题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围绕省情、市情选稿组稿，大力开展政策研究、市情研究、咨政研究和理论宣传，形成了具有浓厚时代特征、地域特点、党校特色的理论宣传平台。

本刊于2003年入编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并进入CNKI中心网站。现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2015年初，本刊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为首批学术期刊。为进一步提高本刊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将本刊打造成为“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的学术名片和重要窗口”，现向社会公开征稿，热诚欢迎广大社科工作者惠赐佳作。

投稿须知：

1. 稿件应当主题突出、观点鲜明、论证严密、语言文字合乎规范，有独到见解，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实践借鉴价值。本刊特别欢迎关于“安徽省情、合肥市情”方面的研究报告。

2. 稿件字数以4000-10000字为宜。

3. 将正文以附件形式发过来，并将单位名称、详细地址、邮编、电话、电邮、摘要、关键词（3-5个）、来稿日期、作者简介（出生日期、民族、职称职务、学历学位、研究方向等）放在正文标题下。

4. 参考文献、注释等放在文尾，勿用脚注或夹注。注释是作者对题名、标题或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须放在正文后的参考文献之前，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圈标注：①、②、③……。参考文献是作者写作论文时所用引文的出处或参阅的各种书刊资料，须集中列在论文的文末，参考文献序号标注：[1]、[2]、[3]……

5. 来稿文责自负，在不改变文章主要观点的前提下本刊编辑部有权对文章作适当修改，若作者不同意修改请在来稿时作特别说明。

6. 本刊已被“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等收录，如作者无特别声明，即视为同意在网站或光盘上同时刊出。

7. 请勿一稿多投。本刊的选稿周期为3个月，3个月内未收到用稿通知的，作者可自行处理。请作者自留底稿，来稿一律不退。

8. 本刊选稿以质量为唯一标准，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来稿一经刊用即付稿酬并寄送2本样刊。

9. 本刊目前并无网上投稿平台，也未委托任何组织或个人代为征稿。一些打着本刊所谓“官网”名义的网上投稿、征稿平台，骗取作者审稿费、发表费的行为，均与本刊无关，均属非法行为。请投稿作者切勿上当受骗。

本刊样刊浏览网址：http://61.132.138.85/dxbkpt/index.php/Kwview/index/id/5.html#
本刊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901号《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邮政编码：230031
联系电话：0551-62206658　62206629
电子信箱：XB1233@126.com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

2022 年第 2 期
（总第 94 期）
双月刊

主管单位：中共合肥市委
主办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党校
出版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陈得良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俊　王辉龙　王良仲　王　义　王　玉　王智源　江　飞
江　浩　刘玉勉　孙维红　陈得良　何永义　李安福　李敏琪
李宗开　范观兵　金　玥　周良金　胡爱敏　胡厚翠　凌德政
陶晓娟　黄传霞　程千宜　瞿晓陆

主　编：马　俊
编　辑：黄宁平
朱少家
徐书琴

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不断提高战略思维能力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王玉堂(3)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探索……孙　浩(7)

中国人民从精神被动转入精神主动的历史嬗变……杨　琳(15)

坚定不移把新时代伟大自我革命推向纵深……吴　斌(20)

策论园地

关于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若干思考

——基于合肥市宗教工作大督查经验的浅析……合肥市委统战部课题组(25)

版权声明

本刊已许可本刊合作单位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发　行：《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通信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901号
邮政编码：230031
电　话：(0551)62206658；62206629
电子信箱：xb1233@126.com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674-5000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4-1249/Z

安徽省政府专项债券问题研究……吴义达(29)

领导干部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 李　平(35)

学思札记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四维”引导……何红连　陈黎梅(4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综述……曲直　程晋富(47)

信息荟萃

“合肥：创新的天地”等六则……(54)

不断提高战略思维能力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王玉堂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进行战略思维的战略型政党，历来高度重视战略策略问题，并不断提出科学的战略策略。党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制定和实施一个个重大战略来实现的；党的百年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不断进行战略谋划、战略决策、战略调整和战略实施的历史。战略思维能力，简单地说，就是谋深、谋远、谋全局、谋未来的能力，就是观大势、谋大事、把大方向、定大政策的能力。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提升战略思维能力，前提是站得高、看得远，核心是想得深、谋得准，关键是会决策、善落实，重点是有定力、不摇摆。

[关键词]战略思维　战略思维能力　战略主动　战略定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1]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极具针对性，而且极富战略远见，为领导干部锤炼战略思维、提升战略能力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一、战略、战略思维、战略思维能力

“战略”本是一个军事术语，意为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现已被广泛用于各个领域。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说过：“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2]175他还进一步解释说：“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2]175战略思维则是指从全局视角和长远眼光客观辩证地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的科学思维方式，体现的是一种战略整体观、全局观和敏锐的洞察力、预见性，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实际工作中的自觉运用[3]。现实生活中，人们常说的“战略眼光”“战略头脑”等，其实都是战略思维的通俗化表达。

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约翰·柯林斯曾称中国的“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4]209。孙武在《孙子兵法·兵势篇》中说：“善战者，求之于势。”[4]68有句棋谚强调：“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势”就是形势、趋势，“谋势”就是进行战略谋划、作出战略判断，属于战略思维的范

收稿日期：2022-02-14

作者简介：王玉堂，山东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合作博士生导师，山东省领导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畴。战略思维能力，简单地说，就是谋深、谋远、谋全局、谋未来的能力，就是观大势、谋大事、把大方向、定大政策的能力。

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战略型政党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进行战略思维的战略型政党，历来高度重视战略策略问题，并不断提出科学的战略策略。党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制定和实施一个个重大战略来实现的；党的百年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不断进行战略谋划、战略决策、战略调整和战略实施的历史。从毛泽东同志提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5]1298 的著名论断，到邓小平同志发出“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6]384 的谆谆告诫，都是我们党善于战略思维、长于战略谋划、重视战略策略的体现，是对党长期奋斗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精辟概括。邓小平同志多次说过，“我们党历来是重视战略的，部队的战士、伙夫都关心战略，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了”[7]198，否则，“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好多事情都不好办”[8]72。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战略思维“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8]9，领导干部一定“要有战略头脑，通观全局，科学地安排各项工作”[9]134，善于“用战略思维去观察当今时代，洞悉当代中国”[10]20，“既有老黄牛的品格，又有千里马的气势；既是一个有胆有识的战略家，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9]149。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战略策略的研究和把握，正是贯穿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维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智慧，孕育于革命战争时期，成熟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纵观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总是能够在重大历史关头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这是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1]。恩格斯有句名言：“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11]847 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不仅“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而且“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是司马迁眼中“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非常之人”，他们都具有卓越的战略思维能力，都是公认的杰出战略家。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将战略思维应用于战争实践，系统阐发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问题、抗日战争的战略预见和战略指导问题、解放战争的战略选择和战略决战问题、战略上藐视敌人与战术上重视敌人的问题、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问题；系统研究和回答了“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中国革命”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展现出着眼长远的战略预见、胸怀全局的战略部署、审时度势的战略调整，领导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2]148。新中国成立不久，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挑衅和武装威胁，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战略远见，以“不惜国内打烂了重新建设”的决心和气魄，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避免了侵略者陈兵国门的危局，捍卫了新中国安全[13]。“战略思维，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恢宏的革命气度”[8]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面对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4]197，制定了到 21 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极富领袖气质的政治智慧和极富战略思维的远见卓识，审度大势，筹谋全局，擘画未来，牢牢把握战略主动，领导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说到底是战略上的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1]在党的历史上，如果没有当年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战略大转移，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在这次战略大转移途中，平均每 300 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15]。他们“走的是高山峻岭，渡的是大河险滩，过的是草地荒原，但每一个行程、每一次突围、每一场战斗都从战略全局出

发,既赢得了战争胜利,也赢得了战略主动。这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智慧"[8]53。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战略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成语"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一着"说的就是战略问题。只有战略判断准确、战略谋划科学、战略布局合理、战略实施有效,才能把握战略机遇、赢得战略主动,从而做到"临大事而不乱、闻雷霆而不惊、涉风波而不疑","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宋·潘阆:《酒泉子·长忆观潮》)。因此,重视战略思维、提升战略思维能力意义重大,既是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能力支撑,也是有力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复杂局面和风险挑战的现实需要。

三、提升战略思维能力的路径选择

战略思维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又是一种思维能力,体现的是一种胸怀与格局、眼界与境界。提升战略思维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遵循一定的途径,从多个方面下功夫。

(一)提升战略思维能力,前提是站得高、看得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1]战略决策的本质是战略选择。要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决策者必须站得高、看得远,洞察古今、通观全局,努力提高自己的"眼商"[16]。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时深刻指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2]175,"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2]221。高瞻才能远瞩,"会当凌绝顶"才能"一览众山小",全局在胸才能胜券在握。作为领导者,既要有登高望远的境界、格局和追求,善于观大势、谋全局、察细微,"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17]394-395,从而做到"远见于未萌,避危于无形",又要有挺立潮头的勇气、自觉和豪情,始终坚持用系统观念、普遍联系的观点,从全局视角,用长远眼光,站在时代最前沿,观察和分析问题,科学把握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并据此作出判断和决策。"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18]417要善于以史为鉴、"以往知来,以见知隐"(《墨子·非攻中》),科学把握历史和现实、历史和未来的关系,坚持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认识和把握规律。唯有如此,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在拨云见日中辨清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预先看到前途趋向"[17]394,进而赢得战略主动,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二)提升战略思维能力,核心是想得深、谋得准

古人云:"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历史的经验表明,临事深思,好谋而成。想得深、谋得准才能蹄疾步稳、事遂人愿。战略思维穿越时空的深邃性、远瞻性,要求领导者在观察和思考问题时,一定要有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视觉,善于"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19]381,"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20]139,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新时代新阶段,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遇之大疫情交织叠加,国际格局深刻演变,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8]213。毛泽东同志曾告诫全党:"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20]197作为领导者,必须强化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摒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走一步,看一步"等被动思维,善于从大局、大事、大势上着眼,走出庐山看庐山,深思远谋、深思细谋、因势而谋,努力抢占破解难题、化解矛盾、应对风险挑战的战略制高点,牢牢把握战略主动。

(三)提升战略思维能力,关键是会决策、善落实

执行力是战略思维能力的一个重要维度。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彻底执行政策,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21]21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战术来落实和执行,落实才能出成绩,执行才能见成效。"[10]88"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明·张居正:《陈六事疏》)决策与落实是领导工作的两个维度。用心作决策、用力抓落实是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22]。考察、评价一个领导干部,不仅要看他说了些什么,更要看他做了些什么;不仅要看他的战略谋划、战略决策能力,更要

看他的战略实施、战略执行能力。战略可以复制，差别在于执行[23]163。没有战略执行力，再好的战略规划、战略目标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曾说："我们'说话算数'，不是说了就算，而是说了就做，说了不做，等于不说。"[24]600这里，"说"就是决策，"做"就是执行。一打纲领不如一步行动。说而不做，决而不行，决策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也就是说，只有战略而没有行动是无济于事的。身处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面对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增强执行意识，提高战略执行力，以一抓到底的狠劲、一以贯之的韧劲、一鼓作气的拼劲推动战略实施，努力把战略化为行动，把蓝图变为现实，一步一个脚印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四）提升战略思维能力，重点是有定力、不摇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战略方向、保持战略定力，继续团结一心、艰苦奋斗，风雨无阻向前进。"[25]战略定力来自正确的战略判断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战略自信。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面对当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不确定性、境外敌对势力的战略遏制和反华宣传，面对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任务，只有保持强大战略定力，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才能始终做到头脑清醒、意志坚定、判断准确、谋划科学，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否则，一旦缺乏战略定力，就会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2]222，陷于手忙脚乱的境地，甚至可能丧失原则和底线，犯下方向性、颠覆性错误。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心怀"国之大者"，面对"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惑和"枯松倒挂倚绝壁"的险境，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定战略自信，不为杂音所扰、不为诱惑所动、不为挑战所惧、不为困难所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砥砺奋进、勇毅前行，努力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

四、结语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清·陈澹然：《寤言·迁都建藩议》）对领导干部而言，提升战略思维能力，就意味着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做到对大局了然于胸，对大势洞幽烛微。要善于"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全面深化改革全局来思考和研究问题"[26]81，既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度，又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宽广胸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要科学把握战略和策略的辩证统一关系，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坚持以正确的战略指导策略，以科学的策略服务和落实战略。要坚持把战略思维与辩证思维、系统思维结合起来，科学把握表与里、近与远、小与大的关系，善于把谋事与谋势结合起来，既解决现实问题，又解决战略问题，防止只会低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善于把解决具体问题与探究、化解深层次矛盾结合起来，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善于把局部利益放在全局利益中去把握，防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善于把眼前需要与长远谋划统一起来，防止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善于把国内形势与国际环境联系起来，防止闭目塞听、固步自封，这样才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8]10。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继续把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引向深入 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N].人民日报,2022-01-12.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董振华．领导干部要着力培养战略思维能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体会之八十六[J].前线,2015(5):62-65.

[4]孙武.孙子兵法[M].孙晓玲,译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

[5]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9]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下转第14页)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探索

孙　浩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摘要]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围绕“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初步探索，在缘何选择社会主义、选择何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何以实现三个维度阐述了“社会主义”这一科学概念。在这一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阐释社会主义的理论意蕴、研判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状况等方式探索“社会主义”概念的民族化与本土化，使其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通过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诠释，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塑造了“社会主义”科学、先进的理论形象，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社会主义　概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在近代中国吸引了诸多爱国志士的关注与讨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孕育着中国革命方向的论争也就此展开，“社会主义”概念之辩开始流转于各个派别。中国共产党创建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共党员给予“社会主义”概念以新的意义与诠释，在同其他主义的论争中塑造了“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理论形象。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概念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核心概念之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概念的研判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指导，也为“工农武装割据”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要明晰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认知理路，就必须从中国革命的基本命题即缘何选择社会主义、选择何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何以实现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缘何选择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

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考察，就必须厘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在阐述“社会主义”概念时，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视角，对资本主义发展特征与趋势进行了初步梳理与解读，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昭示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一）弊端与困境：资本主义孕育了自我崩溃之因素

“不懂得资本主义，就不会懂得社会主义。”[1]404欲揭示社会主义的优势，就必然要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进行分析与研判。虽然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特征与中国国情认知不够全面、深刻，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科研项目“百年之初：中国共产党诞生史研究”（立项编号：20JJD710005）。
收稿日期：2022-03-22
作者简介：孙浩，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态势尚未系统掌握，但仍对资本主义本质进行了初步的解读，指明了资本主义自我崩溃的根本原因。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认可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性，指出，“资本制度能把全社会分散的资本集中起来，使家庭的农业手工业进而为大规模的机器工业，并使社会物质的文明增加可惊的地步”[1]403。在此基础上，他们归纳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两大优势，即资本集中与财产私有。资本集中使资产阶级推翻了家庭手工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形成了资产阶级的社会；财产私有则使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资本家之手，推动了资本产业的扩大再生产，使资产阶级的势力遍及西欧与北美各国。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指出，正是这两大优势即财产私有制下的资本集中孕育了资本主义自我崩溃的因素，使得资本主义在生产与分配等问题上造成了不可挽救的危机。

生产组织扩大化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崩溃，针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中国共产党人从两个方面展开批判。首先，生产组织的扩大化使生产活动日趋社会化，无数劳动群众为少数资本家所束缚、掌握。这种变化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并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其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缺乏社会的调节与统计，陷入无政府状态。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不受政府监管，亦不受社会需要的支配，而是为了竞争私利盲目增加商品，使社会生产超过社会需求，即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因为社会需要而生产，乃是因为增加他们出卖的‘商品’而生产；只为出卖而生产，非为使用而生产，所以是‘商品’不是‘用品’。”[1]403 这种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扩大化与社会需求不能满足生产之间的矛盾一旦爆发，便会引发资本主义的恐慌。如李大钊所说：“资本主义制度能使社会破产，使经济恐慌和贫乏，能使大多数的人民变为劳动无产阶级，而供奉那少数的资本家。”[2]331

财产私有使得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从而深陷殖民战争的泥潭。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资本主义分配方法的致命缺陷在于财产的私有。财产私有使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其他人则逐渐丧失购买力，因而造成生产力与消费力失衡，引发剩余生产的恐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失衡，是指生产力超过消费力，而非超过社会需要，这也是资本主义的弊端所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为缓解本国的剩余生产压力，将商品倾销至其他国家，以商品换取货币，由此产生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为了保有与增加殖民地，各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要抵抗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另一方面要组织强大军力抢夺新的殖民地。这便是“资本的帝国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搜寻垂尽，帝国主义者间相互争夺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之反抗，这三者合起来乃是帝国主义之致命伤。”[1]405 就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而言，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条件，是财富的积累与资本的增值，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工人逐渐走向联合，“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3]412-413。

（二）升华与超脱：社会主义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主义

通过对资本主义固有弊端的分析，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人类社会历史演化的进程，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超脱性，将社会主义塑造为“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主义，既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与初心，也推动了“社会主义”概念为劳动群众所熟知。

在塑造社会主义的形象之前，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对“社会主义”概念即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诠释。对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中国共产党人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认知过程。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诸多主义各行其道，社会主义者与反社会主义者时常开展论战，社会主义的真谛也在这一阶段逐渐阐发出来，“知识阶级中表同情于资本家的与表同情于劳动者的两派，旗帜越发鲜明”[4]490，中国共产党人也借此对社会主义的宗旨、立场、内涵加以诠释与宣扬。就其宗旨而言，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认识到，社会主义是立足于世界、为全人类而奋斗的事业。正如恽代英所说：“社会主义学理上的根据，以为人类是共存的，社会是连带的。我们要求个人的幸福，必不可不求全人类的幸福。”[2]478 就其立场而言，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阶级斗争的作用，认为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废除私有制，实现社会财富公有。李达在同梁启超辩论时便指出：“要谋社会全体的福利只有把这种自由竞争和私产制度永远除去，而建设永久的共产社会。

阶级由对峙而斗争，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势以成。”[4]494-495 就其内涵而言，李大钊从三个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概念的内涵：一是政治层面，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之目的；二是法律层面，必须废除旧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实现公有制合法化；三是经济层面，应当给予劳动者分配自身收益的权利，即“必须使劳动的人，满足欲望，得全收利益”[5]245。

在明晰社会主义的定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继而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比优势塑造“社会主义”概念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资本集中，(二)财产公有”[1]406。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者并非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集中，他们所反对的主要是财产私有。因为实现财产公有之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分配方式便全然改变了。在财产公有制即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社会生产将不复以前的无政府状态，而是依据社会需要进行生产，以满足需要为指向，而非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在分配层面，剩余劳动随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而消逝，也就不再有保持生产力与消费力均衡的必要，因为社会生产是依据社会需要进行的，不会有剩余生产的风险。“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销纳剩余生产的帝国主义即侵略主义”[1]407 也便失去了意义，如此方可实现世界的和平。

此外，中国共产党人还基于经济组织的变化趋势佐证选择社会主义的必然性。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孕育了自我崩溃的因素，“旧经济组织的自然变化，已指教我们：帝国主义的那条旧路是不能再向前走的了”[1]405。而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除了帝国主义之外，便只有社会主义道路可走，这也是人类社会之历史演进的趋势，因为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指出，中国要救亡图存，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以走，只有靠中国人自己探索，披荆斩棘，扫除障碍。

可以说，通过对缘何选择社会主义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塑造了“社会主义”概念的先进性与科学性，也指明了通往社会主义的曲折性与长期性。在同其他主义论战的过程中，既加深了自身对于“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也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推及广大劳动群众。

(三)世界与中国：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诠释与形塑“社会主义”概念时面临的核心命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决定了能否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为阐释社会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中国共产党人从经济、政治与阶级力量对比等角度论述了当时之中国已经具备了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

李大钊指出：“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6]359 可见，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各国的经济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已经不能离世界而独立，因此，要论证社会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须先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情形之变化。

政治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旧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随即迎来一波高潮。但俄国革命引起了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恐慌，他们联合起来通过改善工人地位、镇压劳工运动等方式压制各国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正如瞿秋白所说：“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国急取攻势，俄国无产阶级独力奋斗，而西欧工人方畅心满意于社会改良政策。”[7]463

经济方面，受“一战”影响，欧洲诸国不仅政治动荡不安，经济亦遭受极大损失，甚至已到接近破产的境地。“如英国素来是一个有钱的国家，战前是世界的债权国。战后变为美国的债务者。”[1]405

为了维护国内政局的稳定，恢复国家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将目光投向广袤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一方面设法缓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加紧掠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资源。这就导致中国虽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实业的阶段，“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6]359 由此，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中国已经具备了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并且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因为“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6]359。

对社会性质的认识决定了道路与方向的选择,在研判中国政治经济情形之前,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揭示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表面上虽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个半殖民地”[1]414。中国的政治经济实权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因北洋政府名义尚存,不算是完全的殖民地,但现今之中国,“不论国会省会的议员,无不是大军阀小军阀的机械”[8]48,更遑论北洋政府。中国政治实质上受制于帝国主义,中国现在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皆处于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之下。陈独秀也总结道:“总统、内阁、国会都建筑在军阀势力上面,而军阀又压倒在外国帝国主义国家之下,这是中国现在政治实在情形。”[1]416

就中国的经济现状而言,“国内新式生产机关绝少,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4]490 因为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共营的阶段,中国继续追逐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脚步,“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万里,我们尚在初步”[6]359。加之中国的经济状况,如关税、工商业、金融、交通、矿业等完完全全由资本主义国家所支配。基于此,李达作出了判断:“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4]499 因此,若要改变中国实业之薄弱,抵抗资本主义的剥削,社会主义是最合适的革命道路。

通过对世界与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剖析,中国共产党人阐述了社会主义何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何以能拯救广大劳工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使得“社会主义”概念同中国革命现实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中国革命指引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二、选择何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马克思派社会主义”

通过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析,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论证了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当时的中国存在着许多社会主义派别,究竟应选择何种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又是哪一种社会主义?这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诠释“社会主义”概念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人对几种主要社会主义流派的分析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社会主义各流派之间因政见不同而争执不休,除共产主义之外,当时流传较广且有组织力量的社会主义流派主要分为四种,即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为诠释真正的“社会主义”概念,中国共产党人对以上几种主要的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分析与批驳。

1.基尔特社会主义:鼓吹经济与政治相分离

基尔特社会主义亦称“行会社会主义”,是20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潘蒂、霍布逊、柯尔等。五四时期,经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引介与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流派之一传入中国,曾在中国思想界占有一席之地。基尔特社会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希望在工会的基础上建立生产联合会,继而掌握生产管理权,他们主张改善工人的条件,但不推翻现存社会制度,意图通过改良的方式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基于经济与政治二元论与职能划分,主张国家与基尔特(工会)各负其责,即由劳动阶级(工会)掌握生产管理机关,由资本家掌握国家政权机关。他们主张“用蚕食手段,渐渐获得生产管理权,以达到工业自治的目的”[1]407。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基尔特社会主义在同中国共产党人的论战中逐渐败下阵来,陈独秀指出,他们有两个不可掩蔽的缺点,“(一)把压制生产劳动者底国家政权法庭海陆军警察完全交给资本阶级了;(二)政治事业和经济事业有许多不能分离的事件,例如国际贸易之类事也”[1]128。

2.无政府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空想主义

20世纪初,欧洲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被部分留日、留法的中国学生所接受,进而传入中国。他们将中国传统的“大同”“均平”等思想糅杂在其中,形成了中国无政府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刘师复、黄凌霜、区声白等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流行较为广泛,在全国主要城市都建立了团体。他们主张绝对的自由,反对一切强权,主张消灭国家、政府、警察、监狱等。在财产所有制问题上,他们主张废除私有制,消灭家庭。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前,无政府主义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因为他们主要反映的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等对专制剥削的反抗。但由于无政府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其本质上是一种空想主义。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马克思主义者与无

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从经济与政治两方面对无政府主义展开批判。在经济方面，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绝对自由“因为没有强制力去干涉调节，自然会发生生产过剩或不足的弊端”[1]129；在政治方面，若废除法律与国家机关，社会必然运转困难，“凡有社会组织，必有一种社会制度，随之亦必有一种法律保护这种制度”[1]129。因此，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层面，无政府主义都是走不通的。

3.工团主义：站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对立面

工团主义又称“无政府工团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是法国的索烈尔和拉加德尔等。工团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中间分离出来的学说，在中国虽存在一些拥趸，但并没有形成广泛影响。工团主义的主张主要有两点，一是阶级斗争，源于马克思主义；二是不要国家及政权，出自无政府主义。由于工团主义否认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对立方，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失利而消亡。

4.国家社会主义：逐渐走向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这里所讲的国家社会主义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分化出来的社会主义流派，常被拿来同共产主义作比较，两派的具体主张存在着明显区别。就主张而言，中国共产党人在四个层面揭示了国家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一面。其一，国家社会主义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劳资携手的理论，但“已令劳动者从事选举活动，已利用资本阶级底政府国会采用社会政策改善劳动底地位”[1]131，这实际上已经放弃了阶级战争的革命手段，走向了改良主义。其二，国家社会主义主张通过议会实现社会主义，但议会制度本是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而设立的，通过议会政策废除资本私有制，其成功率尚不可知。单议会政策本身便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一贯的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主张。其三，国家社会主义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9]27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明明是马克思的主张，国家社会主义却弃之如敝屣。其四，生产机关集中到国家手中对于共产党来说是最初的手段，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却是最终的目的。国家社会主义具有很强的国家主义色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国共产党在国内尚未统一时便致力于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见，“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格斯底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格斯”[1]133。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上述几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分析与批驳，进一步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与认知，也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二)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底科学的社会主义”

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诠释来看，他们所讲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指“马克思底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交锋中，中国共产党人着重阐释了共产主义的主张与原则。

共产主义主张实行坚决的阶级斗争，这点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不同。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之上，集合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最具革命性的先进分子组织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即共产党。阶级斗争取得胜利后，应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与工团主义不同)，并且通过无产阶级的国家压制资产阶级的反抗，加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之中。“然后渐渐灭绝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及私有习惯与心理，建设无产阶级的工业与文化，最后达到废除一切阶级无国家的共产社会”[1]411。

关于共产主义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人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阐述。第一，坚持科学的根据。所谓科学的根据，即根据社会历史演进规律与现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做出判断。对于改造社会，不能只看到主观的改造意愿，而必须在客观上观察社会的物质条件是否有改造的可能性。第二，社会改造应按步骤进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取得政权的步骤与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10]49。因此，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清晰的认知，陈独秀指出：“因为各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进步各不相同，所以改造的步骤不能一致。”[1]412 第三，每一个步骤都要采用革命的方法。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是一蹴而

就的,“从组织共产党一直到实现社会主义，其间须经过几多步骤,每个步骤之中,或者又须经过几多曲折的步骤，但每个步骤都必须采用革命的方法,不可采用改良的方法,这是革命的马克思派之特色”[1]412。

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维护正统的“社会主义”概念,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展开过多次论战,深刻剖析了诸如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几种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缺陷与反马克思主义本质，同时也向中国人民尤其是劳动群众展现了共产主义的科学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概念的认知更为全面,开始初步擘画中国的革命道路。

三、社会主义何以实现: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道路的初步探索

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而言，走向社会主义是救亡图存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方式、革命阶段等问题加以解答,同时也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一)革命方式: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

“社会主义”概念总是同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就是劳动阶级应该如何开始奋斗”。[1]418 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两点原则。

一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无产阶级的特性决定了他们比任何一个阶级都更为集中,更具有组织纪律性。同时，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低下,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所拥有的只有劳动力。这就决定了“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11]8。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应当积极参与革命运动，将农民、小资产阶级等其他阶级团结在自己周围,通过暴力手段打倒军阀等反革命势力，引导着其他阶级革命到底。如瞿秋白所说:“无产阶级应当引导大多数半无产阶级的份子，成就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而以严厉手段镇服资产阶级的反动,并且遏制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畏怯不前。”[8]204

二是必须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关于中国革命的方式与途径,中国共产党人指出,夺取政权大多分为两种手段,一是平和的;一是革命的。采取平和的手段大多从议会、宪法着手,但这种运动多归于失败。因此,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一如李达所说:“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动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而所谓直接行动,“就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争斗手段”[4]506-507。陈独秀也认为,虽然国内的资本主义力量较为薄弱,但帝国主义的压迫迫使中国人不能不采用革命的方式了,因为 “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底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底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1]133。

(二)革命阶段: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分歧

关于社会主义的革命阶段,李大钊认为,中国若要达到社会主义，应当采取革命的方法,“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2]205。意即革命成功之后，应当直接采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陈独秀等则认为无产阶级应该先帮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等待资本主义获得发展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指出,社会主义唯有通过纯粹的国民运动方可实现。即“团结民众的势力,满具革命的精神，绝不与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这就叫纯粹的国民运动”[1]419。在陈独秀的设想中,只有推翻了帝国主义与军阀,取得国民革命的成功,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才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瞿秋白则指出:“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能生出社会主义来，只有他能造成社会主义公有生产资料之技术上的基础。只有他能造出数量多而觉悟深的革命无产阶级。”“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民权主义)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种子才能开始萌动——那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才显然暴露。”[8]191-192 在瞿秋白看来,无产阶级应当首先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将帝国主义与军阀推翻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实现建设社会主义之目的。瞿秋白在此特别强调“劳工阶级”应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权,最终实现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在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阶段上,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初期并未达成一致的意见。直至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协助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的政策,这一分歧才得到暂时解决。即“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

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2]289。在国民会议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统一全国的人民政府。这实际上承认了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这也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使得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逐渐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党的力量遭受了极大损失。

四、奠基与镜鉴：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社会主义”概念探索的理论意义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12]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虽然对于“社会主义”概念的探索尚存有分歧与误区，但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缘何选择社会主义、选择何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何以实现三个维度的阐释，明晰了社会主义的适用性与科学性，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推动了“社会主义”概念的中国化，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借鉴与指导。

（一）理论武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在一百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12]，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在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阐释与探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发生了论战与冲突。在论战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深化了对“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认知，从而初步总结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几个特征。第一，对于共产党来说，将生产机关集中到国家手中是必要的手段；第二，真正的共产主义是致力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三，共产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最终要造成的是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

真理愈辩愈明，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论战，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廓清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关于为何选择社会主义、选择何种社会主义的疑问，有力地回击了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对马克思主义的污蔑，同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划清了界限，将俄国共产党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榜样，明确指出，“只有俄国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1]133。通过论战，“科学底社会主义” 即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成为指导中华民族实现独立与解放的思想武器。

（二）理论具象：推动了“社会主义”概念的中国化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2]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自创建初期便面临的重大命题。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3]651。可见，只有通过民族形式实现马克思主义，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初期便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在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诠释与探索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也推动了这一概念的中国化，将晦涩的理论概念同中国的革命现实结合起来，以说明社会主义与中国的适配性。中国共产党人在缘何选择社会主义、选择何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何以实现三个维度阐释“社会主义”概念的同时，立足中国国情，论证了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中国，在经济文化发展较为落后的情况下，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完成民族革命的任务。这实际上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民族形式展现出来，推动了“社会主义”概念的中国化，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论具象，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基础。

（三）理论借鉴：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经验与指导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12]中国共产党人在诠释“社会主义”概念的同时，也对中国革命道路与革命方式进行了讨论，虽然在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方面存在一定分歧，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何以实现所进行的设想为中国革

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理论借鉴，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如在革命领导权方面，李大钊认为必须由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瞿秋白也指出无产阶级是觉悟最深的阶级，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必然在于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何以实现的命题中，陈独秀等人提出了国民会议运动的主张，即全国各革命阶级团结起来，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召开国民会议，以此作为革命胜利后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一主张不仅初步提出了统一战线思想，也为国共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奠定了基础。

此外，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认知也存在一些不成熟的地方。比如虽然坚持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但并未深入研究无产阶级应当如何取得并维护自身的领导权；对于中国革命的连续性的认知不够清晰，并未完全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摇摆性缺乏分析与了解等。但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概念的诠释与探索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社会主义”一词广为人知，也对后来“工农武装割据”革命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指导与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1]陈独秀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文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5]李大钊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6]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7]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8]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9]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0]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习近平.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N].人民日报，2021-02-21.

[1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马俊

(上接第6页)

[10]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

[13]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J].求是，2022(1)：4-15.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人民日报编委会理论学习中心组.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J].求是，2021(15)：42-47.

[16]王玉堂.决策：领导工作的起点[J].决策与信息，2016(12)：38-41.

[17]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8]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9]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0]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22] 王玉堂. 决策与落实：领导工作的两个维度[J].党政论坛，2016(6)：38-42.

[23]王玉堂.卓越领导力[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

[24]巴金.随想录[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25] 习近平. 在二〇二〇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1-24.

[26]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朱少家

中国人民从精神被动转入精神主动的历史嬗变

杨　琳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摘要]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和精神脉络,但近代以后,封建统治的奴役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人民陷入极度压抑被动的精神状态。中国共产党彻底终结了封建统治的精神奴役和西方列强的精神侵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开创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由压抑被动到积极主动的巨大变革。党继而在新时代带领中国人民向着精神完全主动奋进,为构建人民需要的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极参与世界治理提供了强劲的精神力量。

[关键词]中国人民　中国共产党　精神被动　精神主动

精神上的主动意味着人们能够在历史实践中发现和彰显自我力量,在推动历史前进中发挥强大的能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1]13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中,中国共产党继承这一优良传统,自诞生起就高度重视人民的精神状态、不断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团结带领近代以后饱经磨难的中国人民挺起精神脊梁,引导中国人民在百年奋斗中逐步生成了更为昂扬、更为主动的精神风貌。中国共产党实现人民精神主动的奋斗历程为中华民族从受苦受难的旧社会解放出来到走向繁荣富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推动力,也为新时代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提供了更为扎实的精神底气。

一、封建统治奴役与帝国主义侵略导致人民精神面貌压抑被动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华民族缔造了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但在中国封建专制长期统治和近代以后帝国主义侵略背景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精神上一度陷入极度压抑被动的状态。

(一)思想土壤的缺失:封建礼教束缚和宗法制度禁锢

古代封建礼教的长期束缚和宗法制度的长期禁锢给中国人民套上了牢固的精神枷锁,使人民在封建统治之下失去了精神自由,逐渐形成一种因循守旧、封建愚昧的精神认知。封建王朝为巩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项目“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微’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立项编号:20VSZ0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2-03-22

作者简介:杨琳,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势力，一方面通过残酷的剥削手段来压榨底层民众，利用高度集权和森严的等级关系来束缚人们的自由，底层民众不得不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努力生存。近代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和压迫更是使人民没有社会条件来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另一方面，封建专制以绝对的统治地位来掌控人们的精神世界，将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封建文化观念渗透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灌输给广大民众，使人们被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封建宗法观念所洗脑，在精神上逐渐麻木，陷入僵化保守的思想泥潭中。长此以往，人民的精神受到封建礼教的钳制，很难从封建制度中抽离出来并生成精神主体意识、追求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毛泽东曾对封建礼教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对旧社会封建婚姻制度表示强烈的反对并呼吁妇女解放和自由恋爱。可见，封建礼教对人们的精神束缚已成为一把牢固的枷锁，中国人民迫切需要打破这种枷锁，摈弃融于血肉中的封建落后观念。

(二)社会条件的缺失：西方列强入侵和外来文化渗透

近代以后，中国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2]3 的悲惨境地。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侵略，不仅是经济、政治上的殖民，更是精神上的殖民。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在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方面一刻也不放松，他们通过设立教会、办学校、办报纸、举办慈善事业和鼓励学生留学来实施文化侵略。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3]404，它们将大量的西方价值观和外来文化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奴化思想犹如“精神鸦片”一样悄无声息地瓦解着人们的独立精神。部分民众更是产生了崇洋媚外的价值观念，“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4]694–695。国家面临着积贫积弱、分崩离析的历史命运，人们在精神上也极度不自主、不独立和不自信，实现精神上的主动更是没有现实根基。鲁迅先生为近代以来人民麻木不仁的精神面貌感到痛心并生动地形容其为“无声的中国”“沉默的灵魂”；蒋廷黻曾言：“军器不如人，自不待说；纪律不如人，精神不如人，亦不可讳言。”由此可见，近代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一度陷入低落、屈辱之中，折射出中华民族软弱被动的精神处境。

(三)方向引领的缺失：先进理论匮乏和组织力量软弱

旧中国是“一盘散沙”的状态，人民在组织上、精神上都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近代以来，无数个革命团体曾幻想选择各种社会制度救中国。面对近代中国“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困境，洋务派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来解决表层问题，在面对封建制度的根本问题上却是“换汤不换药”；面对近代中国“制度不如人”的困境，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先后学习了西方的制度文化，却因为资产阶级组织领导的软弱无力和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走向失败；面对近代中国“思想理论不如人”的问题，先进知识分子学习并引进了三百多种外来思想理论，最终还是没有解决“中国向何处走”的问题。孙中山沉痛地指出：“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堕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虽有大军，无以取胜。”[5]558–559 对此，毛泽东认为从西方学来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方案并不适合中国的社会状况和阶级状况，它们“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6]1514。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没有找到革命的主体力量，没有充分尊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没能将底层民众有力地组织起来，忽视了这个受压迫最深、也是最具革命力量的社会群体；另一方面是没有科学的思想理论做指导。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6]1514 中国人民在精神上陷入了迷茫彷徨，“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7]3

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人民精神上极大觉醒

“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我们党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始终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华民族开始艰难地但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8]6 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彻底扭转了中国人民的

精神面貌,使中国人民挺起了精神脊梁。

(一)中国人民实现精神主动,起始于党终结了封建统治的精神奴役和西方列强的精神侵略

“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147 人们的精神发展状况和实现精神主动的程度也要受制于社会物质条件和发展水平。近代以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底层民众民不聊生。人们没有足够的物质生活保障,也没有自由民主的环境,追求精神主动自然是天方夜谭。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带领人民追求精神主动和独立自主的历程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紧密相连。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结束国家内忧外患的命运,结束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通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帮助农民开展反封建、争自由、争民主的斗争。党的二大确立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最低纲领,为人民谋求“站起来”的独立生活。经过28 年的顽强奋战,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中国人民创造了追求精神生活和挺起精神脊梁的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前夕,党重视调动人民的民主精神,一方面通过对农民开展政治启蒙启发其政治权利意识,另一方面通过系统的组织网络如各级党组织、农会、儿童团等将广大农民凝聚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党重视人民民主的发展,通过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确保人民大众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在精神上也彻底摆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奴役和西方列强的精神侵略,民主意识得到了极大提升,精神世界得到了重塑,精神主动也得到了空前增长。

(二)中国人民实现精神主动,得益于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早在 19 世纪末就传入中国,但“只是零星的、片面的,甚至有误解和歪曲,其社会影响微不足道”[9]6。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得以在中国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十月革命的成功使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可行性,使人民对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有了极大的信心,激发了中国人的革命信念与斗争精神。自此,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马克思主义不仅致力于实现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而且找到了改变世界的主体力量,使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人民才是改造世界的主体,为中国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光明前景。李大钊指出:“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10]280 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扭转了从前西方国家解释历史的话语中心地位,让中国人民得以正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光辉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与中华文化复兴联系起来,“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该完结了……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6]1516 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还使广大中国人“学得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得以从唯物史观的思想制高点洞察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和中国的前途命运。眼界提高了、视野开阔了、觉悟增强了,就可以扫除思想上、精神上的彷徨、苦闷和迷茫,认清通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光明道路。毛泽东曾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6]1516“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6]1470 早期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大势和人心向背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7]3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将马克思主义写在旗帜上,用年轻的力量给予人们新的希望和精神力量。由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个革命面貌的焕然一新,正是中

国共产党与旧式革命者相比,在精神面貌上“焕然一新”的结果。百年来,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始终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党和人民事业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南和强大精神支撑。

(三)中国人民实现精神主动,源自党开创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时就秉承着“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宗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乘风破浪、披荆斩棘,进行伟大革命、建设与改革,使中国人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历久弥坚,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砥砺奋进,使人民在精神上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伟大事业,是向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前进的伟大事业,是始终将“人民生活得幸福不幸福”作为自己执政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伟大事业,更是胸怀人类发展命运、为全人类贡献中国智慧的伟大事业。百年来,党坚持站在全人类的角度,秉承全人类解放价值理念,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2]68-69。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致力于“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1]11-12,“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23。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熠熠生辉,离不开其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需要和人民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更离不开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需求。百年征程中,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彻底扭转了人民精神颓废的历史命运,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实现人民精神完全主动的伟大使命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8]13,人民精神的完全主动意味着个体能够在把握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积极进取、敢于超越的精神面貌,并能够在实践中转化为强大的精神推动力。随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开启,我们需要人民在精神上焕发出更为主动的力量,并将这种精神力量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来构建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实现精神完全主动是构建人民需要的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发展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摆在了突出位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11]13 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当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者并重的社会发展形态。美好生活既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也涉及了人民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需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12]4。其中的“更”字,一方面强调了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逐步提升,说明这种要求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永无止境、螺旋上升的;另一方面说明人们对生活的要求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物质文化需要,更加注重全面立体的美好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的丰盈。对美好生活提出的“质”与“美”的更高要求,需要人民用更昂扬、更积极的精神面貌来追求自己需要的美好生活。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并非追求一种虚无缥缈的精神体验,而是牢牢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精髓,体现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彰显了新时代中华儿女勠力同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矢志奋斗的精神根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过程,就是人们的精神境界不断提升、精神体验不断丰富的过程,也是用精神因子不断充实美好生活的过程。

(二)实现精神完全主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3 物质力量是基础,但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

不可能取得胜利,还必须有精神力量。同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有坚实的物质力量,还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精神因素、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精神力量。“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9,精神主动一经开掘,也会变成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久动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需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精神力量形成合力,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百年来,中华儿女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迈过了一道道关卡,解决了一个个历史性难题。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人民实现精神完全主动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和价值方向引领,是新时代铸就民族精神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实现精神完全主动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

近代以后,中国受西方列强欺凌,被辱为“东亚病夫”。1949 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改革开放后,党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新格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道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守初心使命,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从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写入联合国决议,到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进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再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为世界卫生和人类安全作出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带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致力于带领中国成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向世界不断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从近代以后被迫卷入世界发展洪流到主动选择开放国门、融入世界,再到今天的积极引领世界发展、主动解决全人类发展难题,中国对待世界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彰显出中国人民的精神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华民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自立、自强站在世界舞台上。强起来的新时代必然要求强起来的精神,正如马克思所畅想的“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人民需要以完全主动的精神面貌、胸怀天下的精神品格来引领世界发展,积极承担世界发展责任、敢于担负人类发展使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孙中山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6]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8]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9] 王树荫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第 2 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0] 李大钊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1] 习近平.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1 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马俊

坚定不移把新时代伟大自我革命推向纵深

吴　斌

（东台市委党校，江苏　东台　224200）

[摘要]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具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自我发现问题、以刀刃向内的巨大勇气自我解决问题、以无私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克服自身问题、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时刻保持头脑清醒等鲜明特征。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是引领和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根本保证。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要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落在实处、推向纵深，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关键词]自我革命 本质特征 重要意义 推进措施

“坚持自我革命”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过去一百年能够成功和未来继续成功的重要法宝，为新时代坚持刀刃向内、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要把党坚持自我革命的成功经验传承好运用好，不断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纵深，“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1]

一、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鲜明特征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政治品格。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构建起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自身纠错机制，确保党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

（一）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自我发现问题

中国共产党能够主动接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动自觉地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具有正视问题的自觉，敢于直面问题、从不讳疾忌医，主动征求意见，欢迎来自各

收稿日期：2022-03-14

作者简介：吴斌，中共东台市委党校办公室主任，讲师。

方面的监督。

(二)以刀刃向内的巨大勇气自我解决问题

中国共产党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后不是听之任之,而是以刀刃向内的巨大勇气,通过积极运用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四种形态”、斗争、监督、执纪、问责等机制、方法和途径,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决不让发现的问题累积成堆、积重难返。例如,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盲动和“左”倾冒险、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两个凡是”、管党治党宽松软等问题,都是我们党自我发现并解决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2]

(三)以完全彻底的革命精神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党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就不怕被老百姓批评,就能勇于抛弃错误。”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2]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初心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是为了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行自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是没有任何保留、没有任何余地、不讲任何条件、不为任何私利所左右的无私无畏的完全彻底的自我革命,能够以完全彻底的革命精神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

(四)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时刻保持头脑清醒

强烈的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深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常怀远虑、居安思危、防范风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明确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告诫全党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1]。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告诫全党:“我们党历经百年、成就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2]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3]。中国共产党具有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品格,做到了敬终如始、居安思危、不忘根本,取得再大成就都不骄傲自满,走得再远都不忘初心和使命,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时刻防止发生颠覆性错误,保持高度的清醒和执着。

二、深刻认识党坚持自我革命的重要意义

(一)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4]中国共产党是坚持自我革命的党,不能坚持自我革命就不是中国共产党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虽然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形势任务,但是,坚持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却是一以贯之的。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就有“党的纪律”专门章节,对全党提出了严格的纪律要求。党的五大首次提出“党的建设”范畴,首次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加强党内监督。在延安整风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先后通过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开展整风运动和整党,提高党员的政治能力和思想水平,克服居功自傲和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清理党员队伍中的消极落后分子和不纯分子。党的八大从加强思想教育、健全制度、加强监督等方面提出了管党治党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先

是从 1983 年开始用三年半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整顿，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三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学习教育。党的十三大提出“从严治党”，十四大将“从严治党”写入党章，十七大提出从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等五个方面加强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对党的自身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推进自我革命，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并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向基层延伸，党在自我革命的锻造中更加坚强。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只有坚持自我革命，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二）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封建王朝在夺取政权和初掌政权时，往往励精图治，处处用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统治集团精神懈怠、贪图享乐、滋生腐败，又不能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终致政权更迭，人亡政息。这就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成为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的宿命。就国际上来看，苏联亡党亡国表明苏联共产党没有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历史周期率的问题，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生死考验。1945 年，当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提出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毛泽东同志给出了“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的第一个答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2]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外靠群众监督，内靠坚持自我革命，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跳出了历史周期率。现在，经过坚决斗争，虽然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行，并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防范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成伙作势、‘围猎’腐蚀还任重道远，有效应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还任重道远，彻底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实现海晏河清还任重道远，清理系统性腐败、化解风险隐患还任重道远。”[5]“七个有之”等问题还没有彻底消除。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只有持续保持清醒头脑，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才能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坚持自我革命是党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

“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要实现这一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要求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而要领导人民不断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党自身必须过得硬。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将“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个明确”的重要内容，习近平“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战略思想深刻地表明：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处于重要地位、发挥着关键作用，是引领和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政治保障。“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打铁必须自身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如果管党治党宽松软、自身不硬不强，能办好的事情也办不好，能办成的事情也办不成，就会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100 年来，只要我们坚持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党和人民的事业就能很好发展，而一旦放松自我革命，党的建设宽松软，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害。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只有继续坚持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三、坚定不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落在实处、推向纵深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关键还得靠我们党自己。”[6]坚持自我革命,我们党走过了胜利的一百年,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征途上,我们要传承好发扬好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宝贵经验,坚定不移将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落在实处、推向纵深,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人民的主心骨。

(一)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了党的自我革命的政治方向和效果。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推进伟大自我革命，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始终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7]要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团结一致地朝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行。要把“两个维护”体现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做好本职工作、履职尽责的实效上。党员干部要自觉在政治历练中增强政治自觉、提升政治能力、锤炼忠诚品格。要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切实做到“五个必须”,坚决防止和纠正“七个有之”。要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不断强化政治监督,督促引导党员、干部悟透党中央大政方针,扎扎实实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做表面文章、不打折扣,时时处处向党中央看齐,坚决纠正本位主义、自由主义,确保决策执行不走样、不偏向、不变通,持续取得新成绩;督促引导各地各部门全面、完整、准确地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上见实效。

(二)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

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只有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才能使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协调的行动、坚定的意志、强大的战斗力,才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推进伟大自我革命,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

一是坚定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4]坚持自我革命最重要、最基础的方式,就是筑牢理想信念根基。革命理想高于天,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战胜自我、战胜风险挑战,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靠的就是理想信念的强大支撑。“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共产党人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4]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国内外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和风险挑战的考验,党员、干部必须固本培元,把稳思想之舵,筑牢信仰之基,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守住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奋斗终身。

二是强化理论武装。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6]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4]马克思主义是党进行伟大自我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在新征程上推进伟大自我革命，必须继续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全党，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统一全党的思想、意志和行动。党员干部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持续用心用力，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三是开展好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以开展集中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经常性教育的方式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与党员的党性修养，是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推进伟大自我革命，必须继续开展集中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经常性教育，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水平。当前主要是认真总结党史学习教育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建立长效化、常态化的制度机制,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果,持续深入学习党史、用好党史。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长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作为各级党校和干部培训学校的主要课程，作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学习的主要内容，不断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

(三)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

党的作风绝不是小事,体现的是党性,反映的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推进伟大自我革命，必须以钉钉子精神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不断厚植党的群众基础,夯实执政根基。

一是坚持弘扬优良作风。100年来,党形成了一系列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要继承发扬好。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锲而不舍地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实施细则精神。“关键少数”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真正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标杆、当好表率。要牢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坚守人民立场,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回应群众关切,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要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推动党和人民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坚决纠治不正之风。要通过教育引导,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抵制不良作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坚决纠治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侵害漠视群众利益、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入整治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的形象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严肃查处玩忽职守、推诿扯皮以及不尊重客观规律和实际情况的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坚决防止不正之风反弹回潮，不断巩固和拓展作风建设成果。

(四)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

腐败同党的性质宗旨水火不相容，是党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威胁，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推进伟大自我革命,必须以零容忍态度,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坚持严的主基调,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紧盯重点人群、重点领域,从严查处,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堵漏洞补短板,完善制度约束,规范权力运行,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家风建设和警示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党性觉悟,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坚持“老虎苍蝇蚊子”一起打。“老虎”腐败虽然少,但影响一大片,“苍蝇蚊子”腐败虽然小,但是发生在基层群众身边,都要严肃惩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斩断受贿行贿、围猎被围猎腐败利益链,从根本上破除权钱交易关系网。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等的腐败案件。“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2]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

[2]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J].求是,2022(1):4—15.

[3]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1-11-12.

[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

[5]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 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N].人民日报,2022-01-19.

[6]继续把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引向深入 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N].人民日报,2022-01-12.

[7] 冯俊. 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N].人民日报,2022-02-10.

责任编辑:马俊

关于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若干思考
——基于合肥市宗教工作大督查经验的浅析

合肥市委统战部课题组

[摘要]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宗教工作的新理念新举措，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怎样认识宗教、怎样处理宗教问题、怎样做好党的宗教工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入学习领会、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和贯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清醒认识宗教工作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等特点,对于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宗教工作　宗教治理　宗教中国化方向

引言

按照市委的决策部署,2021 年合肥市委统战部组建 30 个督查小组,对全市宗教工作进行了一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地毯式”大督查。督查组历时 19 天，共督查 122 个乡镇（街道、社区、园区）、21 个宗教团体、663 处宗教活动场所、市及各地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重点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委关于宗教工作决策部署、执行《宗教事务条例》及相关法规、党委(党组)和宗教工作责任人履职、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基层宗教工作信息员作用发挥等 8 个方面内容。督查组深入基层摸实情、直面群众问心声,广泛接触各级党政干部、基层信息员、信教群众、宗教教职人员等,访谈座谈 950 人,了解掌握真实情况。这次督查得到广大信教群众的拥护，发现并有力推动解决了一批宗教领域问题，切实维护了全市宗教领域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一、合肥市宗教现状

安徽省合肥市居皖之中，是长三角副中心城市,人口近千万。合肥市宗教历史源远流长,佛、道、伊、天、基五教俱全,信教群众近 10 万人,其中基督教 55117 人、占 65%,伊斯兰教 10355 人、占 9%，天主教 913 人、占不到 1%。宗教教职人员 363 人,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 651 个,宗教团体 29 个,宗教院校 1 个。佛教和道教信教群众多,但普通信教群众没有严格的入教程序，人数难以精确统计。此外,多种民间信仰与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结合在一起,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的群众较多。

二、主要做法

近年来，合肥市委统战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基本原则,积极推进“组织机制规范化、人员管理规范化、活动场所规范化、财务管理规范化、队伍建设规范化”等五个规范化建设。

(一)加强组织管理,确保责任“零缺位”。一是

收稿日期:2022-03-19

课题组组长:耳东(合肥市委统战部研究室主任);成员:张凯(合肥市委统战部四级主任科员)。

进一步落实三级网络两级责任制。紧紧抓住宗教工作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构建落实主体责任的工作体系,做到党委“不松手”、党委书记“不甩手”、班子成员“不缩手”。二是建立健全包保联系制度。推动建立市、县、乡、村、组五级包保联系制度,将宗教领域各项工作和每项制度细化、量化、标准化,落实到各个环节、各个岗位、各个责任人,做到任务层层分解、压力层层传导、工作层层落实。三是强化督查问效和考核。明确乡镇街道宗教事务属地管理责任,制定责任清单,将宗教工作情况列入年度目标考核内容,建立健全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村级宗教工作的指导督促,明确专人负责宗教工作,实行周通报、月调度、季总结,对因工作不力影响整体工作开展的进行通报批评,对因工作不重视、责任不落实导致发生重大问题的坚决严肃追责问责。

(二)突出协同管理,确保衔接“零断档”。一是始终坚持一盘棋思想,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强力推进宗教工作。对各成员单位宗教工作职责进一步完善,制定《合肥市民族宗教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清单》,发挥“大脑中枢”作用,谋事、议事、定事,形成定期调度、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二是建立健全情况沟通、信息共享、会商研判、联合执法的跨区域、跨部门协调联动机制。特别是注意加强同综治维稳信访中心的联动,补齐短板弱项,定期会商研判,推进联合执法、综合执法,形成治理非法宗教活动的合力。同时注重把党政、群团、社会组织等方方面面的资源力量和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不断巩固扩大红色阵地,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大宗教工作格局。三是注重发挥基层宗教工作信息员“前哨站”作用。严格执行《合肥市宗教工作信息员制度》,强化对全市 1704 名基层宗教工作信息员的考核管理力度,压紧压实基层宗教工作信息员工作责任,保证信息员队伍保持相对稳定。加强宗教工作信息化建设,建立基层宗教工作信息直报系统,利用“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充分发挥信息员触手作用。

(三)规范标准管理,确保场所“零死角”。一是推动宗教活动场所标准化建设。制定基层宗教工作规范化建设指导意见,建立健全宗教活动场所民主管理组织议事规则、财务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并公开上墙,接受宗教事务部门和信教群众的监督,做到用制度管人、用制度办事,把宗教活动场所的各项活动纳入制度化管理轨道。全面清理场所内宗教非法出版物,深挖线索来源,有效提升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水平。二是积极推进宗教活动场所资金标准化管理,完善奉献箱管理三人小组和财务监督小组机制,制作制式《宗教活动场所现金入账登记本》,落实宗教活动场所现金收入登记入账制度,创新设立“资金管理云平台”覆盖全市所有宗教活动场所,形成“平台统一、管理专业、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财务监管机制。三是实现宗教活动场所进出人员标准化管理。加强宗教活动场所安全管理,组织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宗教场所教职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法律法规、安全常识的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警惕意识、防范意识和紧急处置能力。落实宗教活动场所信教群众刷卡进出措施,做到“人、证、号、册”的一一对应、有机统一。

(四)严格依法管理,确保防控“零疏漏”。一是配齐配强配优基层宗教行政执法队伍。实现合肥市本级及 12 个县(市)、区、开发区新成立宗教行政执法队伍全覆盖。合肥市本级及 12 个县(市)、区、开发区共安排新增行政编制 26 个、政府购买服务 23 名,其中 9 个县(市)区共核定增加行政编制 24 个,政府购买服务 19 名,全部实行“专班专人专岗专责化”管理。通过“三个一批”,即选调一批、招考一批、转任一批,配齐人员力量。二是加强对风险隐患的摸底排查、监测预警、分析研判。在全面排查梳理本地区宗教工作基础信息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常住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宗教信仰摸底,逐一排查、人人过筛,确保乡(镇)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重点紧盯失联失控人员,主动把握风险走向,谋求工作主动,善于观察态势,勤于发现苗头,确保风险隐患“看在眼里、放在心里、记在脑里、抓在手里”,精准阻断“爆点”的导火索,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三是进一步巩固深化整改成果。深入总结宗教工作大督查工作经验,继续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对已完成整改的问题和新识别出的风险点进行评估梳理,建立健全“清单+闭环”风险隐患预警、“回头看”和应急处置机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准应急要点、掌握处突规律,一手抓化解、一手抓报告,防范境外渗透组织与境内非法组织勾连。紧盯被打击取缔但仍暗地里活动的非法宗教组织,防止出现区域性联合,始终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设置群众信访有奖

举报制度,实现宗教领域“群防群控”,在关键时刻有针对性进行稳妥慎重处置,形成强大震慑。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宗教工作重视程度有待提升。少数领导干部对宗教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宗教工作“无小事”但也“出不了大事”、基层宗教工作的一点问题不足以影响全局;有的存在“就事论事”思维,没有真正认识到宗教与日常工作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二)宗教工作规范化管理有待加强。基层信息员制度执行存在打折扣现象,信息员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宗教团体规范化管理意识不强,宗教活动场所民主管理存在短板,少部分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还存在不规范问题。

(三)境外宗教势力渗透更加隐蔽化。境外宗教势力加速同境内非法组织勾连,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渗透活动,其手段越来越复杂、方式越来越隐蔽。有的计划对青少年群体进行非法渗透、有的假借资助贫困儿童名义向未成年人传教等,一些宗教渗透组织具有明显的“非宗教”特点,具有很强的欺骗性。

四、新形势下做好宗教工作的对策措施

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尊重宗教工作规律,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完善工作举措,健全工作制度,压实工作责任,着力提升宗教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共同创造社会和谐宗教和睦的良好局面。

(一)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健全和完善宗教工作体制机制。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是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根本保证。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宗教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明确党委主要负责人为本地区本单位宗教工作第一责任人,党委统战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本地区本单位宗教工作直接责任人。不断健全和完善宗教工作协调处置机制,修订完善宗教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把宗教治理纳入政治巡察重要内容,加强对宗教工作的规划、引领、指导、督查。严格落实宗教工作三级网络两级责任制,动态调整宗教工作信息员队伍,做到人员相对固定,确保基层宗教有人管、有人问。把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方针政策纳入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必学内容,作为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培训必修课程,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信教群众在基层,宗教工作重心在基层,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管理功能、服务功能,把宗教事务管理纳入基层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发挥其在道德教化、伦理约束、文化引领等方面的作用,扎牢防止宗教渗透和无序发展的篱笆。

(二)提升“导”的工作水平。《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要坚持以“导”的态度对待宗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导”的根本指向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导宗教界在政治上形成正向共识,正确地“收”和正确地“放”,就是正确地“导”。通过构建宗教工作理论教育培训体系,多层次、全方位开展宗教理论政策培训,提升党政干部宗教理论素养,把“导”的工作理念融入工作实际,提升“导”的工作能力水平,最大限度团结信教群众,不断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针对当前宗教工作“六化”(小型化、分散化、隐蔽化、网络化、利益化、极端化)特点及年轻化趋势,建立宗教工作包保联系制度,加强跨地区交流协作,充分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提高宗教治理智慧化水平。切实有效发挥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开展以“五送”(送法律、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送温暖)为代表的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和特困群众关爱行动,注重健全农村低收入人群常态化帮扶机制,有效消除宗教对群众的精神诱惑,着力铲除滋生非法宗教活动、宗教渗透蔓延的土壤。

(三)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指导宗教界以“一引两导四进四有”(即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宗教中国化导向、坚持宗教工作法治化导向,国旗国歌、宣传标语、法制教育、道德模范进场所,有主题活动、有专题讲稿、有规章制度、有社会服务)为主要内容,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教育和引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坚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净润,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发扬我国宗教界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和衷共济的优良传统,自觉把宗教自身发展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支持各

宗教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和时代进步的、健康文明的内容，淡化和摒弃消极落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讲好宗教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故事，从“能讲、会讲”到“讲到心坎上、讲到行动中”，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依托省会城市高校资源，建立区域性宗教研究平台，开展宗教政策法规、互联网宗教治理、宗教人才培养等方面理论研究，形成区域性智力合力，成为推动宗教治理的不息引擎。

（四）持续深入推进宗教工作治化建设。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不断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紧盯中央关于宗教工作的大政方针，认真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安徽省宗教事务条例》，围绕宗教界反映强烈、社会普遍关注、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哪里缺就补哪里，构建完备的宗教事务法规制度体系，完善宗教工作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以“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江淮普法合肥行”等为平台，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遵守宪法法律，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增强他们依法依规开展宗教活动的自觉性，增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公民意识。处理宗教领域问题，要发挥市县乡三级执法队伍作用，始终坚持依法依规，创新行政执法方式，多做理顺情绪的工作，以事实为依据，是什么性质就按什么性质处理，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防止把宗教领域问题泛化扩大化。持续推进宗教活动场所合理布局，对较为复杂的情况采取“一处一议”，把宗教活动场所的各项活动纳入制度化管理轨道，持续推动宗教活动场所标准化建设，执行好民主管理制度，规范财务、人员和内部出版物管理，确保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到位。

（五）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宗教团体是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宗教团体的领导人不仅要有行政管理能力，还要有较高的宗教学识和深厚的信教群众基础。要定期举办宗教团体政策法规培训班，组织开展宗教团体负责人季度学习会，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大力加强宗教团体领导班子、工作班子建设，改进民主管理方式。建立宗教团体内部的人才培育机制，把接受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爱国爱教、有一定宗教学识和在信教群众中有一定威望的优秀青年宗教教职人才充实进去，培育一支梯次合理的后备力量，支持他们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营造健康和谐积极的氛围。充分发挥宗教团体主观能动性，提升宗教团体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能力，完善内部民主监督等各项规章制度，同时为宗教团体解决实际困难提供必要的帮助，让他们能够独立开展工作。强化宗教团体服务能力，提升服务意识，规范各项工作程序，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使服务性工作成为提升宗教团体吸引力凝聚力的有效途径。

（六）打造过硬宗教工作队伍。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引领能力、把握政策能力、法治思维能力、群众工作能力、贯彻落实能力，着力打造一支精通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熟悉宗教工作、善于做信教群众工作的宗教工作队伍。做宗教工作的“内行人”，精准把握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讲究方式方法，开展宗教政策法规轮训，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加强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深入研究和妥善处理宗教领域各种问题，认真学习新理论新政策新规定，保持“本领恐慌”、加快“本领升级”。做信教群众的“贴心人”，深刻认识和把握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广大信教群众是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下沉驻点、督查督导中深入基层一线，在解决问题中走进信教群众、宣传信教群众、凝聚信教群众、服务信教群众，做群众最“盼”的事、抓群众最“怨”的事、帮群众最“难”的事，不断提升宗教工作队伍能力水平。做提升状态的“解题人”，以“穿透式分析问题、问答式谋划举措、持续式推进工作、现场式督查进展”工作方式，尽心竭力、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以解题人姿态应对宗教工作的突发性、偶然性、不确定性，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层层剥笋、找出病灶、分析原因，以务实行动和有力举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局面。

责任编辑：马俊

安徽省政府专项债券问题研究

吴义达

（安徽省委党校，安徽　合肥　230022）

[摘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合理发行和运用，是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的有力支持和保障。文章从 2015 年以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情况出发，分析了安徽省政府专项债券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注重专项债券发行管理及项目管理、完善专项债券信息披露制度、防控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风险等解决措施。

[关键词]安徽省政府　专项债券　问题　政策建议

一、引言

201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正案正式通过，同年《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出台，进一步规范了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明确了“开前门、堵后门、修明渠、堵暗道”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思路。地方政府拥有独立的举债权，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已成为其新增债务的唯一渠道。

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和持续性的减税降费，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矛盾加剧。专项债券作为地方政府债券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可以缓和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有力地支持和保障了安徽省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特别是近两年来，专项债券资金大多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卫生医疗健康、乡村振兴等方面，对进一步改善安徽公共交通、补齐卫生医疗健康短板、促进乡村振兴、扩大有效投资等具有积极意义，更好地发挥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六稳”“六保”的保障作用。

二、近年来安徽省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情况

从债券发行主体、规模、品种、期限、利率和债券余额等六个方面分析安徽省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情况。

（一）发行主体

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是安徽省政府，但绝大部分资金都转贷给市、县（区）政府使用。

（二）发行规模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GDP 增速放缓背景下安徽省政府债券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研究”（立项编号：2020CX080）。

收稿日期：2022-03-20

作者简介：吴义达，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理论研究所副教授。

安徽省从2015年开始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债券发行规模基本上呈逐年增加趋势，2015-2021年先后发行了256亿、730亿、817亿、1316亿、1186亿、1678亿和2085亿元专项债券。2021年安徽省共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48只，全年累计发行规模为2085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43只，发行额为1665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5只，发行额为420亿元。

(三)发行品种

专项债券发行品种日益丰富(见表1)。2015年，置换专项债券是当年发行的主要品种(随后连续发行4年，2019年后不再发行)。置换专项债券以2013年政府性债务审计为基础，对企事业单位举借的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专项债务进行置换，有效地缓释了存量债务风险。2017年，安徽省开始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并随后于2018年开始发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和收费公路专项债券。2019年后，安徽省发行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募投领域向基建倾斜，开始发行基础设施专项债券。2020年，安徽省发行再融资专项债券，并开始创新发行专项债券品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项债券。2021年又创新发行了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专项债券品种；同年还发行了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用于安庆农村商业银行等四家银行补充银行资本。

表1 2015-2021年安徽省政府专项债券品种

	专项债券品种
2015年	置换专项债券、普通专项债券
2016年	置换专项债券、普通专项债券
2017年	置换专项债券、普通专项债券、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2018年	置换专项债券、普通专项债券、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费公路专项债券
2019年	普通专项债券、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基础设施专项债券
2020年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基础设施专项债券、长三角一体化专项债券、再融资专项债券
2021年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基础设施专项债券、长三角一体化专项债券、再融资专项债券、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专项债券、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专项债券

(四)发行期限

长期限债券发行规模呈增加趋势(见表2)。2015-2019年，安徽省发行的政府专项债券期限都在10年期(含10年期)以下。从2020年开始，安徽省发行的专项债券期限开始变长，开始发行15年期、20年期、30年期专项债券。2020年政府专项债券中15年期以上(含15年期)发行规模为545.79亿元，占全年专项债券发行总额的32.52%。2021年政府专项债券中15年期以上(含15年期)发行规模为954.27亿元，占全年专项债券发行总额45.76%。长期限专项债券的推出，极大地缓解了地方政府短期内的还债压力。

表2 2015-2021年安徽省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期限

	专项债券发行期限
2015年	3年期、5年期、7年期、10年期
2016年	5年期、7年期
2017年	3年期、5年期、7年期
2018年	3年期、5年期、7年期、10年期
2019年	3年期、5年期、7年期、10年期
2020年	3年期、5年期、7年期、10年期、15年期、20年期、30年期
2021年	5年期、7年期、10年期、15年期、20年期、30年期

(五)发行利率

专项债券通过招标、公开承销和定向承销形式发行,以市场化的方式确定债券利率。2015–2021 年安徽省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利率在 2.80%–4.20%之间,利率波动较大,2016 年达最低值(2.80%),2017 年达最高值(4.20%)。2017 年以来,整体上看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利率呈下行趋势(见表 3)。专项债券发行利率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地方政府融资成本,减轻了地方财政负担,维持了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

表 3 2015–2021 年安徽省政府专项债券各期限品种的加权平均利率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3 年期	3.27	--	4.20	3.74	3.03	3.21	--
5 年期	3.30	2.80	3.93	3.94	3.27	3.15	3.17
7 年期	3.67	3.04	3.94	4.19	3.38	3.20	3.30
10 年期	3.53	--	--	4.07	3.45	3.09	3.27
15 年期	--	--	--	--	--	3.61	3.54
20 年期	--	--	--	--	--	3.86	3.59
30 年期	--	--	--	--	--	4.09	3.62

数据来源: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平台

(六)债券余额

随着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数量逐年增加,安徽省政府专项债券余额占比逐年提高:从 2015 年的不到 20%,增长到 2021 年的 65%以上(见表 4)。

表 4 2015–2021 年安徽省政府专项债券余额及占比

单位:亿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全省政府债券余额		1719	3273	4611	6556	7880	9535	11502
一般债券	余额	1463	2287	2808	3391	3581	3753	4018
	占比	85.11%	69.87%	60.90%	51.72%	45.44%	39.36%	34.93%
专项债券	余额	256	986	1803	3165	4299	5782	7484
	占比	14.89%	30.13%	39.10%	48.28%	54.56%	60.64%	65.06%

数据来源: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平台

三、专项债券实际运行中的问题分析

(一)债券规模和结构方面的问题

1.债券规模增长过快

专项债券规模的快速增长会增加地方政府政府性基金预算的压力。新增债券发行额年年增加(见表 5),2021 年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是 2015 年的八倍。专项债券余额增长迅速, 从 2015 年 256 亿元,到 2021 年的 7484 亿元,2021 年专项债务余额是 2015 年的 29 倍。近年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率连续攀升,特别是 2021 年已超过 120%,专项债券规模的持续增加使债券违约风险不断增大(见表 6)。同时,债务规模的不断增加,对后续举债空间造成挤压。从安徽省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情况来看,截至 2021 年末,安徽省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为 7484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为 7949 亿元[①],专项债务余额与限额之比达 94.15%。

表 5 安徽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

单位:亿元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	215	497	873	1186	1496	1665

数据来源: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平台

表 6 2019–2021 年安徽省政府专项债务率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亿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余额(亿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率(%)
2019 年	4813	4299	89.32
2020 年	5296	5782	109.18
2021 年	5957	7484	125.63

注: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余额/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数据来源: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公开信息平台数据进行整理

2.债券结构不够合理

长期债券占比过高。2020 年和 2021 年专项债券发行中,10 年期以上(含 10 年期)债券发行额占比达到四分之三,债券发行期限逐年拉长。实际偿债对再融资(借新还旧)的依赖性较大。2020 年发行再融资专项债券 182 亿,当年专项债券还本 479 亿,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占专项债券还本额比为 38%。2021 年发行再融资专项债券 420 亿,当年专项债券还本 383 亿,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占专项债券还本额比为 109%,且再融资专项债券期限基本上是 30 年。再融资专项债券的超长期发行增加了利息成本,加大未来的偿债压力,损害代际公平。

(二)债务信息披露方面的问题

1.债务信息披露不够完整

省(或市)政府只披露本级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情况,没有对全省(或全市)政府专项债务存续情况进行集中披露,不能让人们对全省(或全市)的政府专项债务存续情况一目了然。各级政府对专项债券资金投资的项目进展情况,没有进行全程跟踪披露。缺少全周期的信息披露,对于各种风险因素更是缺乏覆盖[1]。

2.债务信息披露不够真实

债券发行和债务偿还的主体是省政府,但债券资金使用主体是市、县(区)政府,债券的“发、用、还”主体不一致会产生道德风险。市、县(区)政府为争取债券资金,缺乏对债券项目严格把关的主观能动性,不少地方为拉动投资而上项目,存在内容“包装”,收益虚大[2],导致某些债券的资金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比不够真实。

(三)债务管理和偿还方面的问题

1.债务管理能力相对不足

因项目前期准备不充分、规划调整等原因,安徽省新增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较慢②,影响债务资金绩效。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6 个市、2 个县尚有 26 个当年新增专项债券资金项目支出进度低于 50%,其中 13 个项目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14.44 亿元,仅支出 5338 万元,单项支出进度均低于 10%。从县级专项债券项目来看,存在项目比重高而项目管理能力建设滞后的矛盾[3]。

2.债务偿还方面存在隐忧

2016年11月,财政部印发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预算管理办法》,明确专项债务本息的偿还资金来源于专项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发行置换专项债券(仅限于偿还本金)三方面。专项债券的本息偿还资金来源主要为项目收益和政府性基金收入。由于很多专项债券项目属于公益性或准公益性,很难实现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尤其是欠发达且没有资源的市县,项目收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自求平衡存在着较大风险[4]。在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国有土地收入占绝对比例。2021年安徽全省土地出让收入3243亿元,当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654亿元③,土地出让收入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达到88.75%。专项债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容易产生土地市场不确定性对其偿付风险的传导[5]。随着"房住不炒"政策的出台,房地产市场逐步降温,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受其影响,给专项债券的偿还带来一定的隐忧。

四、政策建议

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背景下,充分利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虽然可以扩大有效投资、发挥政府债券的跨周期调节作用,也是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的必要保障,但同时要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率、防控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风险。

(一)注重专项债券发行管理及项目管理

1.合理确定专项债券发行规模,优化债券资金投向

强化预算约束,均衡地方政府债券余额结构,提升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比例,降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比例。对专项债券余额占GDP比重较大的地市,严格控制其新增专项债券发行。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投向,根据安徽数字经济发展和绿色转型发展需要,重点支持5G基建、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发电、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能源储存、生态环保等领域。

2.审慎项目管理,提升专项债券项目质量

对项目资金需求精心梳理,加强安徽省财政厅与安徽省发改委、行业主管部门的协同配合,切实提高项目储备质量。建立有利于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观和发展观念,明晰地方政府债务主体权责,选择经济和财政实力较强的地市作为试点城市,率先自主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大力加强县级专项债券项目管理能力建设,从基层、项目单位着手,保障专项债券项目质量。

(二)完善专项债券信息披露制度

1.标准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信息披露时间、内容及流程

在信息披露时间上,遵循及时性原则。充分利用现有信息披露平台,让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专项债券发行进度和项目建设进度;除在债券发行时进行信息披露外,发行人应该根据自身财政情况的变化定期(最好是每季度)发布信息披露公告和临时信息披露公告。在信息披露内容上,遵循真实性原则。信息披露内容要真实、全面而详细,落实《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号),公开披露新增专项债券发行信息和专项债券存续期信息。在披露年末专项债券项目形成的资产情况的基础上,详细披露资产形成情况,项目收益情况以及可能涉及的重大事项等。在债券信息披露模板中列示偿债资金来源,细化披露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名称和项目实施主体,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风险及应对措施进行特别披露。在披露流程上,建立责任人制度、信息审核制度和重大事件预案制度。

2.强化债务信息披露的社会监督

在每年的安徽省两会材料《安徽省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及当年预算草案表》中,进一步披露政府专项债务信息,添加与政府专项债务信息相关的表格,包括《省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省本级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各市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安排情况表》《年末省政府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情况表》《年末省本级政府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情况表》等分项表格,以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审议。

(三)防控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风险

1.加强专项债券的绩效管理

认真开展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事前绩效评估、事中绩效监控和事后绩效评价。落实《安徽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皖财债〔2021〕1485号),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三个方面对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评价。一要注重债券资金项目的前期论证与决策评价,在项目筛选时,首先关注项目的公益性,其次是项目的收益性,尤其是“双碳”目标下专项债券项目的环境效益。二要强化债券资金使用过程的绩效监控,协调推进项目设计、施工和运营等阶段。三要科学确定债券资金使用评价指标和标准,建立债券资金使用绩效的动态调整机制,完善债券资金使用绩效的第三方评价机制。

2.健全专项债券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

从债券的发行、使用和偿还方面着手,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做到借债有限额、用款有约束、管理有规范、运营有收益、投资有回报、还款有保障。在债券资金筹集过程中,优化债券限额管理和资金匹配。做好新增专项债券项目审核、分配及发行的统筹衔接,完善现有的限额管理制度,取消现有的规模绝对限额,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率替代现有的规模限额指标。科学确定债券期限,不断丰富债券期限结构,合理匹配资金需求和期限,降低期限错配风险。在债券资金使用过程中,提高资金拨付与落地效率,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加快推进专项债券项目库公开,便于投资者及时追踪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建设进度以及收益情况。在债券资金偿还方面,建立专项债券偿债基金和担保增信制度。考虑到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有限性,新发行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应主要基于“项目自求平衡”的情况,设立专业的地方政府偿债保障机制,按照还本付息总额的100–120%或债务发行额的10%设立偿债准备金[6];引入担保公司、采取购买第三方保险等方式为专项债券提供担保增信[7],从而防范专项债券违约风险。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平台 http://www.celma.org.cn/ndsj/index.jhtml

②安徽省审计厅2021年第1号公告《安徽省2020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https://sjt.ah.gov.cn/public/9912883/40498731.html

③《关于安徽省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2年预算草案的报告》http://czt.ah.gov.cn/public/7041/146445511.html

参考文献:

[1]夏诗园.地方政府专项债特征、优势及问题研究[J].西南金融,2020(8):52–62.

[2]樊轶侠.完善专项债发行使用机制[J].中国金融,2019(13):79–80.

[3]娄洪,杨光,谢斐.更加注重项目管理 助力专项债券政策提质增效[J].债券,2020(4):12–16.

[4]赵全厚,龙小燕.地方政府专项债运营调查[J].中国金融,2020(22):64–65.

[5]王志刚,黎恩银.地方政府专项债目标定位、风险及对策[J].地方财政研究,2021(4):66–76.

[6]蒋菊平,李洪侠.探索中完善专项债制度[J].中国财政,2015(10):15–17.

[7]张锐.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高效发行的机理探析与对策建议[J].南方金融,2018(12):61–66.

责任编辑:陈晓红

领导干部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

李　平

（东平县委党校，山东　东平　271500）

[摘要]《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集中收录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极富哲理性和现实针对性。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引导领导干部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对于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家庭建设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极富哲理性和现实针对性，集中收录在《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1]中。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引导领导干部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进而把自己的家庭建设好，使之成为全社会的样板；把家庭成员教育好，使之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对于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基本单元，是国运昌盛、民族复兴的基石，正所谓“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家人卦》）。自古以来，我国就有重视家庭、重视亲情的传统，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家庭文化。曾几何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家人闲坐、围炉夜话，严父庭堂教子、慈母灯下缝衣，此情此景，此举此动，无不洋溢着浓浓亲情、缕缕温馨、融融欢乐。“家”是中国人心目中最难以割舍的情感寄托，每逢春节，一句“回家过年”，牵动着亿万中国人最真挚的情愫。这种深厚的家庭情结，通过家教、家风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就是中国人家庭情结的生动表达。孟母三迁、曾子烹彘、颜之推教子等家教故事脍炙人口、代代传诵，成为家庭教育的生动案例。《颜氏家训》《钱氏家训》《朱子家训》等家庭文化春风化雨、代代传承，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收稿日期：2022-03-17

作者简介：李平，中共山东省东平县委党校讲师，山东省领导科学学会理事、山东省哲学学会理事。

组成部分。据《中国丛书综录》一书记载，我国古代公开出版的“家训”总共有一百二十多种[2]。这些家训，不仅承载着历史、蕴含着哲理、凝结着智慧，让后人捧之以阅必有得、掩之以思必有悟、付之以行必有益，而且传承着文化、传递着文明、引领着未来，成为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不知道有多少民族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在茫茫旷野里，有多少文明变身一堆瓦砾、几行陈迹，唯独中华民族历经沧桑而不衰。世界四大古文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也只有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下来，并且延续了五千多年而从未断流。就连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不得不惊叹：“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3]117 何以至此？二战前夕，曾有欧洲学者对此作过研究，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是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庭教育的结果[4]。一言以蔽之，是中华民族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传统美德，成就了泱泱华夏、创造了赫赫文明。

二、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历来重视家庭建设。1944 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提出建立模范家庭，这是共产党的一大进步。我们主张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和和气气过光景。”[5]115-116 他还说过，要“生产生活同时并重”[6]530，“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这就是我们的口号”[6]541。朱德同志在《勤俭持家》一文中指出：“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每个人在家庭中都负有一种不可推辞的光荣的养老养小的责任。……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取消家庭，而是要使家庭更幸福更美满。养亲教子的古训，不仅现在适用，就是将来也是适用的。”[7]370 邓小平同志也说过：“家庭和睦也是经常要做的工作。要处理好的，一是夫妻关系，二是婆媳关系，三是妯娌关系，四是父母子女关系等等。”[8]294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将“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9]31 列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的重要内容之一；2016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9]62。家是人生的基点、事业的支点，是梦想启航的地方；家庭美满是事业成功、人生幸福的重要基础。对领导干部来讲，家庭是可靠的后方，是温馨的港湾，是还原本我、存放心灵、注入正能量、收藏负情绪的地方。健康的家庭生活，不仅可以滋养身心，鼓舞斗志，使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而且可以影响带动周围的人跟着学、照着做。否则，一旦后院起火、家庭生乱，不仅不能安心工作，甚至因家风败坏而导致违法乱纪。“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1]55。因此，要想治理好一域，必先治理好一家；要想当好市长、省长，必先当好家长；要想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干好事业，必先管好自己、管好家人、管好家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1]3。他还说，“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1]3，“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1]4。传统文化强调家国同构、家国一体，在“国·家·人”体系中，家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万物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家。”（东汉·荀悦：《申鉴·政体》）国是大河，家是支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反过来，国家好，民族好，家庭才能好。这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的道理。“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大学》第十章）领导干部的家庭具有特殊而鲜明的组织属性、政治功能和示范效应，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强领导干部家庭建设，不仅是事关民族复兴大业的时代命题，也是实现中华民族持久繁荣兴旺的重要保障。因此，必须把领导干部的家庭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把对党忠诚纳入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把教育引导家庭成员爱家庭、爱家人与爱党、爱国、爱人民统一起来,把家庭梦与民族梦融合起来,不断“升华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建设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弘扬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体现共建共享的家庭追求”[1]70,以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以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庭梦托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核心是培育和传承良好家风

“家风”一词较早见于魏晋南北朝,唐以后大量使用[10]。家风,又叫“门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在世代繁衍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传统习惯、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与处世之道的综合体[11]。有家庭就有家风,家风体现在家庭成员言谈举止、为人处世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展现一个家庭的整体风貌,是最重要的家庭软实力。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说:“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也。”[12]119 家是人生的起点,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规家训是人生的第一本教材,家风则是从家规家训中散发出来的“书香”,是蕴涵在家规家训里的哲理和思想,是弥漫在家庭中的空气和阳光,是家庭成员精神成长的源头和动力。历史上那些子孙多贤达、功业多卓著的名门,无不与其良好家风的传承息息相关。家庭建设的最高境界是家和万事兴,其起点、基础和核心是通过立家规、严家训,培育和传承良好家风,使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相契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相贯通。历史的经验表明,唯有这样的家风才能世代传承而不中衰,唯有这样的家庭才能世代兴盛而不败落。

(一)崇尚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该把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的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帮助他们形成美好心灵,促使他们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1]15 崇尚学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立身做人的永恒主题。被称为中华家训始祖的《颜氏家训》,其核心就是“读书做人”。中国共产党靠学习起家,靠学习立党,靠学习执政,从成立那天起,就从未放弃过学习,并且在学习中不断成长成熟,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增强本领[13]108。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讲,崇尚学习、加强学习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一种家庭行为、社会行为;不仅是个人成长进步的需要,更是一种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因此,必须养成重视学习、勤奋学习的良好习惯,始终把学习作为一种行为自觉融入思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融入人生,活到老、学到老,以自己的行动自觉,影响、带动家庭成员形成崇学尚读的习惯。

(二)崇尚修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1]25 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强调“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修身是做人的根本、齐家的起点,也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家庭成员人人注重修身,势必家庭和、家风正、家道旺。领导干部修身,就是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强化宗旨意识,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造福于人民。要多积尺寸之功,注重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慎独慎初、慎微慎欲,培养和强化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

(三)崇尚礼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礼仪是宣示价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14]59“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有礼则身修,心有礼则心泰”(清·颜元:《颜元集·代族人贺心洙叔仲子吉人入泮序》)。中华民族素以重礼仪著称于世。“礼,敬也。”(《墨子·经上》)礼仪的核心是敬人爱人,即敬人如亲、爱人如己。“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应该带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上,都要以礼待人、孝老爱亲、尊老爱幼。家庭内部要互敬互爱,让每一个家庭成员都生活在被尊重、被关爱的氛围中,使他们感觉到家的温暖与温馨。邻里之间要“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以邻为缘、以邻为荣、以邻为亲,友邻、睦邻、善邻,让“邻里和睦也是和美家风”成为家庭成员的共识,让“远亲近邻都是亲,守望相助一家人”成为新时代邻里关系的新气象,以“家庭和美、邻里和睦”夯实社会和谐、稳定

的基础。

（四）崇尚诚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基本道德规范，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1]64。人无信不立，家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诚信是融入骨髓的道德，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纽带。“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二·显王十年》）中国共产党是最讲诚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领导干部，必须从自身做起，从自己的家庭做起，带头诚实守信，努力做到“口言之，身必行之”（《墨子·公孟》），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在诚信家庭、诚信家风建设中的示范作用和家庭在诚信社会、诚信国家建设中的基础作用，让诚实守信成为人们的价值追求，让有诺必践成为人们的行动自觉。

（五）崇尚勤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勤俭是我们的传家宝，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1]15，“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勤劳致富，勤俭持家”[1]25。“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唐·李商隐：《咏史》）勤俭节约、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15]935 领导干部作为治国理政的“关键少数”，必须在勤勉敬业、勤奋工作、勤俭持家上带好头，教育引导家庭成员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少一份干部家庭、干部亲属的优越感，多一份回报国家、奉献社会的责任感，时时处处“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墨子·鲁问》），以一人带全家，以小家带大家，进而影响和带动全社会形成勤俭之风、节约之风、清廉之风。

（六）崇尚劳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16]46，“一个健康向上的民族，就应该鼓励劳动”[1]25。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崇尚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延安时期，王震同志领导的三五九旅，上至旅长，下至马夫、伙夫一律参加生产劳动，硬是把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此前人称“烂泥湾”）改造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17]。劳动创造幸福，奋斗开创未来。作为领导干部，必须要有事必躬亲的思想自觉，带头分担家务，带头干脏活、累活；重要文件、重要讲话要亲自起草，不找秘书代劳，使自己在家庭生活和履职实践中养成热爱劳动、凡事自己动手的良好习惯，让家庭成员在尊重劳动、崇尚劳动、诚实劳动的家风熏陶下，养成坚韧不拔、奋发进取的意志品质。

四、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必须发挥领导干部和领导干部家庭的表率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1]24-25，“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1]34。“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宋·赵湘：《本文》）领导干部都有家庭，但领导干部的家庭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的栖身之地、起居之所，而且还是教化家人的学校、示范社会的样板、引领风尚的航标；领导干部的家庭、家风，不仅关系着自己的作风和公众形象，而且攸关党和政府的形象，攸关党风、政风和民风。加强家庭建设，必须发挥领导干部的主导和示范作用，并善于从以家庭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

（一）“严”字当头，立好家规

家规是家庭的“基本法”，是立家之本、修身之要，是“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以训诸子孙”（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家类》）的法宝。家规不严，家训不张，必然导致家风败坏、家道中落。历史上的教训姑且不说，仅党的十八大以来因治家不严而落马的领导干部就足以令人警醒。习近平总书记曾要求领导干部仔细看一看“家”和“冢”这两个字，它们很像，区别就在于那个“点”摆在什么位置。他解释说，“对家属子女要求高一点才能成为幸福之家，低一点就可能葬送一个好家庭”[1]35，并告诫领导干部必须“坚决反对特权现象，树立好的家风家规”[1]37。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念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1]53 的三条原则、周恩来同志的“十条家规”，为党的干部立规治家、过好权力关亲情关提供了光辉范例。作为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从严治家是对自己也是对家人最好的爱护，要坚持与情、与理、与德、与法并行不悖的原则，宽严有度立好规矩，言传身教做好示范，一丝不苟落到

实处，决不允许家庭成员和亲友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谋取私利，以免为情所累、为情所伤、为情所误[18]。

（二）“公”字当头，恪守家训

家训是家庭的“核心价值观”，是对家庭成员立身处世、持家操业的教诲。新时代领导干部的家训，必须彰显共产党人的理想、信仰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公”字当头，先大家后小家，舍小家为大家，处处体现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崇高境界，任何时候都“不能颠倒了公私、混淆了是非、模糊了义利、放纵了亲情”[1]97。要以“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唐·罗隐：《夏州胡常侍》）的家国情怀，自觉划清情与权、情与纪、情与法的界限。要以“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清·金兰生：《格言联璧》）的自觉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公权力进入私人领地。要注重家教。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尤其要加强对未成年子女的品德教育，教育他们时刻铭记“父辈的光荣，不能作为儿孙辈的老本”[19]109，幸福生活要靠自己奋斗，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1]19。要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

（三）“德”字当头，涵养家风

家风是一种德行传承，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是塑造家庭成员精神长相的“模板”，不仅直接影响一个人做人、做事的风格，而且还是社会风气的根基，影响整个社会风气的形成。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1]24 新时代领导干部的家风，必须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色，具有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更为崇高的价值追求、更为强大的教化力量。“最美奋斗者”郑培民教育家人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他的妻子“不帮人向郑培民带任何信，不传口信，不接受任何礼品”，他的儿子说“在廉政问题上，爸爸把前门，妈妈守后门”[20]，“一前一后”守出了共产党人的清廉家庭、严实家风。领导干部作为一个家庭的“掌门人”，必须坚持以德修身、以德立家、以德治家，带头加强道德修养和党性锻炼，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在身体力行中涵养良好家风。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2]吴雯雯.让家风伴随“姓氏”薪火相传[N].浙江日报，2016-04-07.

[3][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4]刘余莉.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J].中国纪检监察，2016(10)：57.

[5]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7]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8]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共产党党内重要法规汇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

[10] 陈来. 从传统家训家规中汲取优良家风滋养[N].人民日报，2017-01-26.

[11]张琳，陈延斌.传承优秀家风：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J].探索，2016(1)：166-171.

[12]蔡元培.中国人的修养[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20.

[13]王玉堂.卓越领导力[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

[14]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7]王玉堂，李祥彦.善于从党史、新中国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J].传承，2020(3)：57-60.

[18]王玉堂.为官贵“慎”[N].学习时报，2015-06-15.

[19]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习近平在宁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

[20]张景林.上好家风家教必修课[N].中国纪检监察报，2022-02-14.

责任编辑：徐书琴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四维”引导

何红连　陈黎梅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团结全体社会成员完成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与社会主要矛盾之间有着密切关联。为了有效化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应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知、情、意、行的“四维”引导，即在认知层面，确保人民群众正确认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在情感层面，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情感认同；在意志层面，坚定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在行为层面，实现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引导、情感引导、意志引导和行为引导是一个统一整体，不可分割。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　思想政治教育　引导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善于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全面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2]。“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在一定意义上是党领导和带领人民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3]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一直是我们党正确判断形势和准确把握工作重心的基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依据。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团结全体社会成员完成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与社会主要矛盾之间有着密切关联。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制约和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需回应社会主要矛盾，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不断调整教育的主题；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仅意味着人民生活的需要发生了变化，而且还引发了人民价值观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变化，这些都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4]人民群众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情感态度、意志信念，乃至行为实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在思想上疏通相关问题，才能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的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西南大学）2020 年度课题“新时代高校‘三全育人’的现实困境及路径优化研究”（立项编号：2021swupt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2-03-21

作者简介：何红连，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陈黎梅，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价值理想。而要解决思想问题，显然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引导，这就必须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群众、教育群众，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需求观和矛盾观，引导人民群众准确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引导人民群众更好地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引导人民群众为追求美好生活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唯此，人民群众才能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中达到认识上的统一、情感上的共鸣、意志上的坚定和行动上的一致。而要做到有效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应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知、情、意、行的“四维”引导，也即认知引导、情感引导、意志引导和行为引导。

一、认知引导：确保人民群众正确认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能否正确认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动因、性质、方向、范围、特点、内容等的理解和践行，直接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和发展。

（一）时代背景：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

毛泽东同志早在 1957 年就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5]61-62 理论是时代的声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社会发展规律并深刻把握当前中国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论断。“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之际，自成立之日起便肩负起改变社会面貌和性质的重任，并不断探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寻找应对和化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出路。”[6]近代中国遭受内忧外患之困，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贯穿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因此，“站起来”成为当时中国有识之士的价值追求和美好愿望。1949 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同志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7]725。随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转变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8]190。在此基础上，国家的主要任务从革命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成为全体中国人民不断追逐的目标。伴随着中国人民日渐“富起来”，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的重心内容也随之转变。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1。显然，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社会所处的特殊世情、具体国情相结合形成的新判断新理论。这一判断并非单纯的文字表述的变化，其背后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折射出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1]10 的光辉历程。一定意义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史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展开引导工作的社会实践史。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的主题、内容、方法等都会随之调整。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确保人民群众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准确把握和科学理解。

（二）性质定位：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规定并反映了社会基本结构的性质和面貌，制约着社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这两对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9]175-176 社会主要矛盾作为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体现，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察和认识也必须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中。

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并不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相反，它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在新时代应用的印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总结和理论概括。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前提是中国经

济的腾飞,是生产本身创造了需求。生产发展了,人民的需求也随之改变。生产和需求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新需求的产生不是凭空的,其背后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诉求。尽管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0]9 显然,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只是反映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并不足以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

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共产党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经验时谈到,“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5]67 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引导”而非“指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引导”不同于“指导”,它是建立在民主、平等、尊重、友善的基础上进行的双向互动,力图贴近人民群众的内心需要和思想实际,通过“引导”人民群众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解决人民群众的思想困惑,凝聚社会共识,振奋精神力量。为此,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引导不仅仅体现在引导人民群众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还体现在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政治方向。新形势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事实层面有着多样呈现,虽然新时代中国社会的问题还很多,但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折射出的是社会进步,且矛盾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力,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引导人民把握时代问题,坚持正确的导向,突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中的责任担当和使命意识。

二、情感引导: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情感认同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会引起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矛盾的改变,引起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需求的变化,引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侧重点的变化[11]。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不仅体现在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还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积极调整自身,将新时代提出的思想、政治、道德等方面的新问题、新要求与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结合起来。认知是人认识外界事物的过程,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等心理现象。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主观体验。人民群众在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产生客观认识的基础上,还会根据自己主观的价值评判标准和认知体验产生一定的情感反应。这种反应可能是积极肯定的情感,也可能是消极否定的情感。而不同的情感反应则会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情感选择和行为实践。为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人民群众在科学认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升其对社会主义的情感认同。

(一)以理服人:回应社会主要矛盾带来的思想困惑

一般而言,情感认同是一种个体或集体的自然心理认同,情感是现实的反映。要想情感认同持久有效,就需要以理性认同为基石。“无情无理”不能解决人们的各种思想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人正确认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就要注意方式方法,“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12]642“以理服人”就是理直气壮地讲道理,坚持正面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人、教育人,直面现实问题,对人民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作出旗帜鲜明的回应,采取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方式、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将人民群众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思想问题和利益问题是相伴而生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说明伴随着深化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的深刻巨变,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状态和表现形式在承接以往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过程中发生了局部质变,同时也反映了人作为‘主体化的交换价值’的相互对立状态,当前人们的利益在更多领域出现分化、重构与调整。”[13]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必须关注矛盾场域,聚焦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矛盾场域。脱离实际问题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是空洞的,而脱离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来解决实际问题时常也是困难重重。正如马克思所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4]286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叠加共振,挑战前所未有。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原有的社会矛盾

解决了，但新的社会矛盾也呈现出不少问题，“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表现突出。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曾担忧的，“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15]1364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显然，还是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发展”仍然是我国当前的第一要务。“无论是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是破解‘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抑或是跨过‘进一步发展绕不开的坎’，都需要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迎难而上、奋勇前进。”[16]

“新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引领，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提供精神动力。”[17]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引导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在全面科学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发展态势的基础上，对于群众的合理诉求，应积极回应；对于不合理的诉求，要充分解释并进行正确引导。另一方面，要引导人民群众正确看待并处理好不同层次的需要之间的关系，树立自身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观念。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工作，要有耐心、不急躁，采用民主讨论的方法去说服教育人。正如刘少奇在 1955 年 4 月给张难先委员的信中所言：“向人民进行宣传解释工作，打通人民的思想，有时还要等待人民的觉悟。因此，不能性急，也不能提倡盲从。”[18]155 在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界定框架之内逐步解答人民的思想困惑，做到以“理”而非以“力”服人，在理论回应的基础上做到情绪疏导，从而使人民群众认可社会主义，齐心协力解决好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二）以情感人：疏解社会主要矛盾带来的不良情绪

情感往往直接支配人们的行为。“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19]117 情感对思想政治教育引导能够产生巨大的作用。“以情感人”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方法，是以情感介入为先导，以情感力量为支撑，在充满人文关怀的情境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方式。如果说“以理服人”是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的“金钥匙”，那么“以情感人”则是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的“催化剂”。以情感人，核心是“情”。只有建立了共同的价值情感，社会主义才能深入人心。只讲“理”不讲“情”，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就难以引起群众的共鸣；而只讲“情”不讲“理”，用“情感”替代政策、原则，也不能达到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的目的。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引导需坚持“以理服人”和“以情感人”的统一，既要以情动人，又不唯感情论，知情控情，正确处理情与理的关系，做到入情入理，情理交融。

思想政治教育是人与人的双边活动，是思想交流与情感交流的双向活动。人的情感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因而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面对物质与精神发展的不平衡，面对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等发展的不平衡，部分民众难免将社会主要矛盾主观“夸大”。尽管现在中国社会还有很多问题，但取得的成绩是第一位的，存在的问题是第二位的。这势必需要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情理结合的方式来疏解民众的不良情绪。那么，如何做到“以情感人”呢？人的情绪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肯定的情绪与情感，也有消极的、否定的情绪和情感。对于积极的情绪应该鼓励，而对于消极的情绪则应该设法排解与消除。思想政治教育引导通过“双向交流”式对话等形式，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切入点，因势利导，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劳动热情，提高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积极情感体验，引导人民群众看到“党在认识和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分析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也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20]积极的情感认同会发挥“催化剂”作用，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和幸福感。

三、意志引导：坚定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意志是人为了实现确定的目的而支配自己的行动并在行动时自觉克服困难的心理过程。人的意志产生于认知与情感，只有当个体相信某一行动符合认知原则并能给自己带来积极的情感，他

才会产生去实践的欲望。思想政治教育引导需要在认知引导和情感引导的基础上进行意志引导，坚定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形成价值共识，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一）四个自信：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价值旨归，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迁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历史进程。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努力，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任人宰割、备受欺凌的历史，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克服一个又一个时代难题，把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发展到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大国，树立起中国人民的自信，这既包括对过去所取得成绩的自信，也包括回应现实困境的自信，还包括对未来发展的自信。

但是，面对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所呈现出来的问题时，部分民众对现实产生疑惑，甚至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在这种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势必要引导人民群众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自觉地透过现象看本质，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21]695 要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创造新的伟大奇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22]474 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追求的高度肯定。“四个自信”是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保持的一种精神状态，也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精神动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是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支撑。”[23]132 只有始终坚定“四个自信”，凝聚共识，才能激励人民群众直面各种挑战、抵御各类风险、解决各种矛盾，从而更好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二）价值共识：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意志是决定个人行为效果的基本因素，对个体潜能的充分发挥起着重要的作用。意志与信念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信念是意志的核心，是一种人性和道德的确信。纵观人类历史，人们的意志活动总是表现在有意识有目的地克服困难的行为之中。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面前，人民的意志选择，特别是信念选择，直接影响到人民的行为选择。“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24]505 心中有信仰，脚下才有力量。《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要“用党的理想信念凝聚人”。没有理想，没有信仰，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25]326。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中国人民在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历史选择，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精神支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一大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华儿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今天我国的发展进步。要把我国发展得更好，离不开理想信念的力量。”[25]4“我们党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21]115 为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引导人民群众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基础上，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只有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成为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诉求时，才能从许多单个人的精神意志转换为社会发展的历史合力，才能“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中，最大限度把广大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26]565，才能为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意志支撑。

四、行为引导：实现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思想政治教育行为引导即是在思想疏通中引导人民群众规范自己的行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质就是协调好人民内部各种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1]1。

（一）个人层面：争做实现美好生活的奋斗者

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思想政治教育需引导人民通过实实在在的劳动来满足自身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让人民群众争做实现美好生活的奋斗者。人民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总结起来，无非是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方面，而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也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两大动力。回顾历史，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这不仅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也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同理解。而这种进步和变化可从耳熟能详的歌曲中直观感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的一首歌曲《小媳妇回娘家》中这样唱道，“身穿大红袄，头戴一枝花，胭脂和香粉她的脸上擦，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显然，在人民群众的心中，“身穿大红袄”“一只鸡”“一只鸭”就是最直观的美好生活状态。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首歌曲《一封家书》在大街小巷流传开来：“我现在广州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我很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别舍不得穿上吧”。朴素的歌词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广大工农群体背井离乡的生活状态，“毛衣”作为游子关爱父母的物质象征，“书信”不仅是当时日常生活中人民群众传递信息的方式，也透露着追逐梦想过程中对于家庭和亲人的牵念。到二十一世纪，在广大青少年群体中流行的歌曲《青春修炼手册》中这样唱到，“皮鞋擦亮，换上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皮鞋”“西装”已成人民普遍的生活用品，“梦想”的形容词是“克拉”。显然，歌词所反映的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水平获得了很大提高，展现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已经从生存性需要转向发展性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作用的发挥不仅是让人民群众认识到社会的巨大进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更重要的是让人民群众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的巨大进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不是靠别人的恩赐施舍，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和勇气干出来的。“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27]7-8 人的本质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得以确证，“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28]57 美好生活从来都不是等来的、靠来的、要来的，而是靠每个人的努力奋斗创造出来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致力于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幸福美好生活而奋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真实写照。“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概括不仅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而且说明了党治国理政的理念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是相契合、相一致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29]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30]11“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1]19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依靠人民，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构建当代人美好的精神世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国家层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伟大梦想，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我们的方向就是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32]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中必然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如何正确地认识、区分和处理这些矛盾，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问题。而矛盾又总是和利益问题相伴而生的。利益矛盾往往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契机，采取何种形式、使用何种手段来处理社会矛盾往往也影响着一个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利益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存在一定的利益差别和适当的不平衡是合理的。解决的途径显然离不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处理好改革发展的速度与社会承受程度的关系。邓小平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会见外宾时曾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33]225 空讲社

会主义人民不相信。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也指出，要实现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21]336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生产与生活提出了新要求，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提供了理论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虽未发生根本变化，未超出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这个矛盾的本质,但亦有部分质变,即已从‘数量短缺型’供需矛盾向‘优质不足型’供需矛盾转变。这就要求在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上,摈弃过去传统的发展模式，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更加强调创新发展，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34]新发展理念要求通过不断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当然,“有效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不能依靠相对单一的路径，而是要依靠多重路径所形成的‘合力’。有效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须从基本前提、战略选择、理念遵循、主攻方向、价值归依、环境保障、外部借力等方面进行综合使力、整体推进。”[35]为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人民群众排除万难，齐心协力共建美好家园，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

总体而言,作为“四维”的知、情、意、行是一个统一整体,不可分割,情感中包含着认知因素,认知中包含着情感因素,其他亦然。思想政治教育引导要想达到最佳效果，不仅需要充分发挥认知引导、情感引导、意志引导、行为引导诸要素的独立作用,而且要形成一种整体性机制。事实上,“知→情→意→行” 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中的唯一路径,还可以是“行→意→知→情”或“情→知→意→行”或“知→行→情→意”等多种路径。思想政治教育的“四维”引导,并非拘泥于一个阶段或一种路径，而是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实际进行科学的运用,助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本报评论员.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N].人民日报,2022-01-14.

[3]胡水清,杨和英.中国共产党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经验 [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5-14.

[4]王朝庆,王刚.问题与思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向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13):4-7.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0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6]韩艳红.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三重逻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12):45-54.

[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26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8]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9]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0]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11]王永益.问题与思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下的思想政治教育[J].湖湘论坛,2018(2):70-75.

[1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3]陈华洲,赵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型[J].思想理论教育,2019(2):16-23.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6]本报评论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新特征新要求[N].人民日报,2020-12-04.

[17]李海峰.社会主要矛盾变迁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发展[J].人民论坛,2021(36):66-68.

[18]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7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19]列宁全集:第 2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0]田天亮,田克勤.党认识和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程、成就和经验[J].党的文献,2021(6):20-28.

[2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下转第 64 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综述

曲直　程晋富

（信阳师范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思政课建设是我们党一以贯之高度重视的战略任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实地调研、座谈等形式，就思政课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谨、意蕴深远的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目前，学术界围绕这一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主要内容、理论特质、价值意义及现实践履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梳理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化对这一重要论述的研究，为推进新时代思政课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习近平　思政课建设　研究综述

思政课建设是我们党一以贯之高度重视的战略任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学校考察思政课建设，且先后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以及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等一些重要会议上就思政课建设相关问题作出阐释，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谨、意蕴深远的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目前，学术界主要是从这一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主要内容、理论特质、价值意义以及现实践履等方面展开研究和讨论，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全面把握学术界研究进展和已有成果，不仅有助于深入学习和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也有助于发现问题、取长补短，深化对这一重要论述的研究。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形成条件研究

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尽管学者们表述的侧重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从理论渊源、文化血脉、实践基础以及时代背景等方面展开的。

（一）关于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渊源研究

任何一种科学思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都必然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李雅兴、姚功武提出，习近平关于办好思政课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同当代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列宁的一套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以及创立的思想政治工作管理机构、各类学校等实践举措的继承与发展[1]。李丹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教育的意义、目标、方法及原则，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关于理论教育的论述是习近平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2]。就理论渊源而言，学术界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论述、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教

收稿日期：2022-03-21

作者简介：曲直，信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程晋富，信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育思想是习近平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形成的思想源头。

(二)关于重要论述形成的历史文化血脉研究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彰显着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与品质，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提供了丰厚的“营养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3]144 探究其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同样也要置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视角加以认识。李雅兴、姚功武通过对中国历史中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以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论述的分析，认为习近平关于办好思政课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精神和道德教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

(三)关于重要论述形成脉络和实践基础研究

实践是人的认识能力形成和发展的根本所在。厘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脉络和实践基础，无疑重要而且必要。陈冬认为，习近平在福州工作期间的思政教育理念与其“3.18”重要讲话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逻辑原点”“后者是前者的续篇”[4]。郑崇玲、陈晓风提出，习近平在福州工作期间形成的一系列关于学校立德树人的重要论述及实践探索，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基本规律的深刻把握，对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5]。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形成的早期实践基础。王定华认为，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主要经历了系统表述思政课教育理念、系统阐释思政课建设原则以及全面部署思政课建设三个阶段[6]。李雅兴、姚功武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思政课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对延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政课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1]。戴卫华也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思政课建设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思政课建设作出开创性工作，形成了习近平关于思政课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7]。

(四)关于重要论述形成的时代背景研究

时代是思想之母。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及精神实质，必须要准确把握其时代背景。李丹认为，习近平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是在应对国际意识形态斗争、适应国家建设发展要求以及解决思政课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2]。李雅兴、姚功武提出，习近平关于办好思政课重要论述的产生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以及思政课现实困境的直面与化解[1]。戴卫华提到，习近平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历史生成立足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两个大局”的大历史背景[7]。此外，也有学者从习近平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某一方面加以探讨。例如，高泽、韩文斌认为，习近平关于思政课教师素质重要论述的提出背景，应从新时代思政课教学环境复杂性、教师队伍定位、培养使命和教学内容来看[8]。张振芝指出，揭示习近平关于领导干部讲思政课重要论述的逻辑起点，应深刻把握新时代党情、国情和世情的新变化[9]。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主要内容研究

目前，基于整体层面、理论建构视角以及某一重要观点，学术界对这一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作出了一些有益探索。

(一)整体层面的主要内容研究

所谓整体层面，就是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作为一个整体，去探究它本身的内容构件。阮金纯、代庭冲认为，习近平总书记“3.18”重要讲话内涵丰富、意蕴深刻，主要包括办好思政课的根本要求、战略定位、深厚基础、根本遵循、方法论原则以及系统化要求六大方面[10]。李丹提到，习近平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涉及思政课的价值和作用、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思政课守正创新(“三大规律”“三因”理念以及“八个相统一”)和形成办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等内容[2]。郑崇玲指出，习近平关于办好高校思政课的重要论述涉及五重论域，即“关键课程”论、“教师关键”论、“协同育人”论、“守正创新”论以及“关键在党”论[11]。李阳洋、吴燕霞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从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创新、教师队伍建设、大思政格局以及领导机制等方面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总体思路[12]。

(二)理论建构视角下的主要内容研究

理论建构就是把某一思想理论的主要内容，按照一定的理论逻辑进行提炼归纳，将其建构为

要素完备、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周小李、彭小奇指出，习近平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已构成一个内容丰富、意蕴深远、逻辑严密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任务，以“八个相统一”为行动主线，以加强思政课教师素养为关键抓手，以“三全育人”为工作格局[13]。张晋龙认为，习近平关于思政课的重要论述涉及思政课的战略方向、重要地位、基本条件、方法遵循四个方面，系统揭示了思政课建设的内在规律，科学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14]。温波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思政课是什么课”“为什么要办好思政课”“为什么能办好思政课”“怎样办好思政课”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清晰的思想体系[15]。庞申伟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阐述了思政课建设的“根本目标论”、“方法策略论”和“战略方向论”三重论域，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16]。林龙认为，习近平关于学校思政课的重要论述聚焦思政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教师素养、改革创新以及力量源泉五个方面，回答了新时代为何要建设好思政课、思政课教师应具备什么素养、怎样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以及如何为思政课建设提供坚强保证等一系列问题[17]。于桂荣、秦书生指出，习近平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涉及根本依循(加强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要任务(完善课程教材体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关键问题(抓住教师队伍)、活力源泉(“三大规律”“八个相统一”、教育评价改革)以及实践路径(构建思政育人“大格局”)，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8]。

(三)关于某一重要观点的研究

围绕习近平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中的某一论述或观点进行探讨，涉及思政课建设价值意义、思政课教师、思政课改革创新以及党的领导等等。该类研究中，有的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讲话的宣传阐释，有的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并结合现实问题而作出的再阐发。

一是关于思政课建设价值意义的研究。曾文、张耀灿对“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认为可以从政党、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四个方面加以探讨，并提出办好思政课事关意识形态工作大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学生个人思想和谐发展[19]。王瑞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思政课要放在全局、变局、大局之中的论断，阐释了办好新时代思政课的重要意义[20]。骆郁廷、李俊贤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键课程”的重要论断，提出思政课何以“关键”，缘于它是强基固本、铸魂育人、反渗防变的课程[21]。

二是关于思政课教师的研究。其一，侧重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思政课教师素养形成过程的研究。高泽、韩文彬认为，习近平关于思政课教师素质重要论述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要”作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是对前两个阶段提出的教师一般素质的总结升华[8]。其二，侧重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要”的解读。苟颖萍、席永杰指出，“六个要”体现了对思政课教师的政治要求、情感要求、执教要求、眼界要求、内在约束以及道德要求[22]。其三，侧重对教师综合素质能力提升的研究。沈壮海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的重大论断，提出思政课教师要有充分的信心、过硬的素质、改革创新的自觉和高度的职业认同感、荣誉感[23]。其四，注重对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综合性研究。康沛竹、艾四林基于习近平总书记“调动思政课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重要论述，提出要提高教师地位、健全评价奖励体系以及强化教育培养等一系列措施[24]。

三是关于思政课改革创新的研究。主要涉及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的研究。冯务中立足思政课教师视角，提出要深入研究教学内容、要从思维抽象的高度解析问题、要提升自身人格魅力、要在教学中贯穿问题意识[25]。涉及“八个相统一”的研究。康沛竹、艾四林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八个相统一”为推进思政课建设的理念思路、内容形式和方法手段提供重要遵循[26]。也有学者对“八个相统一”进行不同方面的层次归纳和逐条解析。崔延强、叶俊立足“信道”“亲师”“践行”的逻辑思路，认为“八个相统一”分别包含着增强教育目标和教学内容说服力的要求，增强教育方法吸引力的要求以及增强教育环境人文性的要求[27]。

四是关于党对思政课建设领导的研究。吕超、

吴均认为，习近平关于党对思政课建设领导的相关论述丰富了思政课建设主体，为构建全方位、多领域、全覆盖的思政教育格局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进路。[28]黄倍乔则围绕习近平关于党对思政课建设领导的重要论述，系统地阐释了其理论渊源、时代背景、主要内容、特征与意义。她认为，这一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应涉及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领导的重要性、目标原则以及途径，回答了为什么党要加强领导、如何加强领导建设的问题[29]。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理论特质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新时代接续推进思政课建设的总纲领、总遵循，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质。对此，学界主要是从哲学思维方法以及理论特征等方面加以研究。

（一）关于重要论述的哲学思维方法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重视哲学思维，善用哲学方法去观察、思考、分析问题。对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学者们在研究中普遍认为，其贯穿着哲学思维方法。陈金龙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系统、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关于思政课建设的一些问题，彰显着思政课建设的战略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历史思维“五大思维方法”[30]。黄岭峻、许换换立足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视角，重点阐释了习近平关于思政课建设的辩证思维，即宏观层面育人与育才、思政课一体化与跨学段建设的辩证统一；中观层面党的全面领导与把好政治方向、教师与学生、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辩证统一；微观层面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理论与实践以及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31]。丁世林基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提出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彰显着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32]。戚如强认为，习近平关于思政课重要论述具有极强的战略性，且从思政课战略价值、战略定位、战略举措、战略重点和战略保证五个方面构成了目标一致的战略体系[33]。

（二）关于重要论述的理论特征研究

理论特征体现的是理论的内在品质和价值取向。对于习近平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理论特征的研究，学术界关注度不多，成果较少。林龙在硕士论文中将其提炼为时代性、针对性和系统性三个基本特征。林龙认为，习近平关于学校思政课重要论述适应了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创新教学形式、规律、内容、方法以及举措，彰显着时代性特征；针对“思政课是什么课、如何办好、凭什么办好”这个问题展开，同时坚持以思政课建设现实问题为导向，并采取有关应对策略，呈现着针对性特征；提出遵循思政工作规律、教育育人规律和学生成才规律，统筹各学段课程内容和目标定位，思政课教师“六个要”以及思政课改革创新“八个相统一”，体现着系统性特征[17]。

（三）关于教育、思政工作重要论述的基本特征研究

关于这一方面，主要涉及对习近平关于教育、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等重要论述基本特征的研究。例如，梁飞、韩梓轩认为习近平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广泛的人民性和深刻的系统性[34]。沈壮海、黄雄义认为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彰显着深厚的人民情怀、恢宏的战略思维、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时代气息、突出的实践品格以及坚定的中国自信等特征[35]。黄蓉生、樊新华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为切入点，提出习近平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是一个特征鲜明的理论体系，呈现出继承性与创新性的一致、战略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系统性与辩证性的贯通以及针对性与生动性的协调[36]。以上研究虽然并非主要针对思政课建设，但却包含着思政课建设的要素，对于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同样具有借鉴性意义。

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价值意义和现实践履研究

（一）关于重要论述的价值意义研究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这一主题，研究其价值意义的成果不多，且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偶有论述，尚未作出全面而深入的阐释。学者们普遍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重构思政课教育教学提供了基本遵循，为思政课改革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二是主题明确，且多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加以探讨。李丹认为习近平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不仅开辟了思政课教育教学新境界，书写了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新篇章，同时也为转变教学理念、发挥思政课程主渠道

作用指明了实践发展的方向[2]。廖阔则提出习近平关于思政课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思政课建设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难题和工作难题，既为思政课建设开辟了正确航向，也为创新思政教育、助力广大青年学生成长成才提供了方向指针[37]。

(二)关于重要论述的现实践履研究

科学的思想理论从实践中抽象而来，最终要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现实践履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点：一是涉及重要论述的践行路径研究。王学俭、许斯诺提出，“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不只是思政课教师的责任，需要国家统筹好、社会参与好、党委领导好、学校落实好以及教师讲好[38]。肖贵清认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需实现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体系、教学体系以及教师培训的一体化，发挥好思政课教师的关键作用[39]。林龙则明确提到，践行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应从加强党的领导、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各学段思政课一体化以及“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同向同性等方面发力[17]。王新生、张欣然基于思政课主渠道建设层面，强调要围绕“一条主线、两种方式、三个着力点”深拓课程建设实践路径，并为此阐释了南开大学的相关经验做法[40]。余双好认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应以习近平关于思政课系列论述为指导”，更新课程观念、发挥教师主体作用、抓好课程教学主渠道、创新教学内容、遵循教学规律以及提升教学自信[41]。二是涉及重要论述的践行成效研究。余双好、王珺颖指出，习近平“3.18”重要讲话发表以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思政课的地位和作用、课程体系、教师队伍面貌、教学改革以及建设格局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明显进展[42]。

五、研究述评与展望

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这一主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整体上确定了“形成条件——主要内容——理论特色——价值意义——现实践履”的研究框架，且提供了较为有力的依据佐证，为深化这一重要论述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借鉴与支撑。尽管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且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但在研究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就研究数量和性质而言，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部分学者直接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为研究主题，大部分学者多是在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过程中，附带着对这一重要论述的宏观性探讨。已有研究成果中，解读宣传性文章多于学理性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标题类似、重复性研究多于创新性研究的现象。

就研究内容和呈现方式而言，碎片性研究多于系统性研究，且研究内容仍有待增强。

一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或发展脉络缺乏全面考察。一方面，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关注，但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等方面的来源，探讨得不够深入。特别是在对重要论述形成的主体因素方面，很少有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虽然产生于党的十八大之后，但对其萌芽、雏形、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关注度不够。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包含着思政课建设的内容要素。探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发展脉络，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这一重要论述产生的必然性。

二是对重要论述的内容体系归纳不够充分。已有学者对重要论述的内容体系展开初步研究，但系统性仍显不足。一方面，没有对其逻辑框架进行专题探究；另一方面，侧重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逻辑阐释，少有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等一些重要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三是对重要论述价值意义的研究有待加强。主要表现为相关研究成果仍然较少，特别是研究成果缺乏全球视野，没有将其上升到全球或人类的维度进行系统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教育教学就是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希望各国青年用欣赏、互鉴、共享的观点看待世界，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积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献瓦。”[43]思政课教师“要善于利用国内的事实.....既不封闭保守，也不崇洋媚外，引导学生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44]。结合当前世界范围内普遍

存在的世界公民教育理念，同样可以研究与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世界性意义。

四是对重要论述践履路径的研究力度有待提升。宏观层面的研究有余，但存在同质化、解读性倾向；个案研究不足，缺乏实践特色。

就研究视野和方法而言，一方面，侧重单一学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较多，难以形成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容易造成研究的空泛化。另一方面，抽象的理论分析较多，多是基于一个相对静止的视角，缺少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动态把握，且实证研究有待丰富。

就研究趋势而言，整体性研究、跨学科研究应当成为重点。一是专家学者们应当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工作。可以通过学术专著的形式，围绕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发展过程、主要内容、理论特质、价值意义以及现实践履等方面开展专题研究，以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力求准确、完整呈现重要论述的各个要素构件，构建起重要论述的逻辑体系。二是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比如在研究重要论述价值意义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比较研究法，揭示这一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坚持与发展，以及对中国传统德育思想或古代课程建设观的继承与创新，从而说明重要论述的理论意义和理论优势。也可以立足某一地区、某一高校，运用实证研究法，阐释相关做法与经验，以此说明重要论述的实践成效和普遍性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李雅兴，姚功武.习近平关于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4):33-38.

[2]李丹.习近平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重要论述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20.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4]陈冬.习近平在福州工作期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及指导意义 [J]. 理论建设，2020(5):94-98.

[5]郑崇玲，陈晓风.习近平在福州工作期间重视学校立德树人的论述与实践[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5):131-137.

[6]王定华.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的基本遵循[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021(4):77-82.

[7]戴卫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历史生成 [J]. 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21(5):103-108.

[8]高泽，韩文彬.习近平关于思政课教师素质重要论述研究[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21(5):32-38.

[9]张振芝.习近平关于领导干部讲思政课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J].湖北社会科学，2022(2):150-156.

[10]阮金纯，代庭冲.深刻领会办好思政课的思想内涵和理论意蕴 [J]. 社会主义论坛，2019(5):14-15.

[11]郑崇玲.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办好高校思政课的理论贡献[J].绥化学院学报，2020(8):5-8.

[12]李阳洋，吴燕霞.习近平新时代学校思政课建设总体思路浅析[J].信阳农林学院学报，2021(1):149-152.

[13]周小李，彭小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思想的逻辑理路[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9(2):12-17.

[14]张晋龙.习近平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 [J]. 理论研究，2019(3):25-31.

[15]温波.论习近平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论述的科学体系[J].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1-5.

[16]庞申伟.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论述论纲[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3-19.

[17]林龙.习近平关于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论述研究[D].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20.

[18]于桂荣，秦书生.习近平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重要论述的逻辑阐释[J].现代教育管理，2021(3):51-59.

[19]曾文，张耀灿.思想政治理论课作用不

可替代[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7):6-7.

[20]王瑞.从三重维度把握办好新时代思政课的重要意义[EB/OL].(2019-09-04)[2022-03-10].http://www.cssn.cn/sxzzjypd/sxzzjypd_bwsf/201909/t20190904_4967059.shtml.

[21]骆郁廷,李俊贤.思政课何以成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J].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1(1):112-121.

[22]苟颖萍,席永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六要”的内涵及意义[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3):5-8.

[23]沈壮海.办好思政课的根本遵循——写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两周年之际[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1):3-10.

[24]康沛竹,艾四林.建设高素质思政课教师队伍[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3):15-18.

[25]冯务中.如何“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9(1):13-17.

[26]康沛竹,艾四林.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八个相统一”[J].人民论坛,2019(13):108-110.

[27]崔延强,叶俊.“八个相统一”: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的基本遵循[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6):80-84.

[28]吕超,吴均.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根本遵循与实现路径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9(10):173-179.

[29]黄倍乔.习近平关于加强党对学校思政课建设领导的重要论述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20.

[30]陈金龙.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思维方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J].思想理论教育,2019(4):4-8.

[31]黄岭峻,许换换.习近平论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辩证思维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4):39-44.

[32]丁世林.习近平关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述的思维方法[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51-54.

[33]戚如强.习近平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论述的战略思维[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1):4-10.

[34]梁飞,韩梓轩.习近平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述的三重维度[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9(1):54-59.

[35]沈壮海,黄雄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鲜明特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10):8-13.

[36]黄蓉生,樊新华.习近平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基本特征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2020(10):15-20.

[37]廖阔.习近平思政课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及其内在逻辑[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1(31):46-48.

[38]王学俭,许斯诺.“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的战略意义、力量来源、基本要求和实践举措[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5-24.

[39]肖贵清.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基本思路[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34-41.

[40]王新生,张欣然.新时代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J].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1(1):122-129.

[41]佘双好.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价值指针[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3):101-108.

[42]佘双好,王珺颖.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新举措和新变化[J].思想理论教育,2020(5):12-17.

[43]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九届青年论坛开幕式上的贺词[N].人民日报,2015-10-27.

[44]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7):4-16.

责任编辑:徐书琴

“合肥：创新的天地”等六则

合肥：创新的天地

走进长三角，漫步巢湖畔，合肥科创魅力，正在精彩绽放。2021年合肥实现多项重大科学技术突破：“九章”、“祖冲之”上新，光存储时间达1小时，“人造太阳”破千秒燃烧，证明凯勒几何核心猜想……

“合肥这个地方是‘养人’的，培养出了这么多优秀人才，是创新的天地”，“安徽要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安徽考察，都对科技创新作出重要指示，为安徽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合肥在创新驱动的新征程上勇闯新路。

“从0到1”的突破。1056秒！2021年12月30日，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简称EAST）控制大厅里，正在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EAST再次创造新的世界纪录。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俗称“人造太阳”，实验目的是为了利用像太阳一样的核聚变原理，在地球上建成可控核聚变电站，为人类提供近乎无限的清洁能源。EAST创造新的世界纪录，标志着人类向核聚变能源应用迈出重要一步。

除了“人造太阳”惊艳亮相，近年来，合肥市一批“从0到1”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原创成果竞相涌现。量子通信、动态存储芯片等领域实现并跑领跑，悟空探秘、墨子传信等重大科技成果世界瞩目，托珠单抗诊疗方案、重组蛋白疫苗等助力全国抗疫。

树高叶茂，系于根深。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建立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深厚根基上，需下“十年磨一剑”的苦功夫，需怀“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真定力。对于“人造太阳”、量子通信等重大战略的基础研究，早在几十年前，安徽省、合肥市就开始全力支持，把科技创新作为栽树工程，集聚国内外优势科研力量协同攻关。正是多年默默无闻的付出，造就了今天一项项重要研究成果的相继问世。

“创新之花”结出“产业硕果”。科技创新的使命在于“从0到1”的原始突破，更在于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

1988年出生的江如海，是合肥中科智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一直驰骋在“无人驾驶”广阔征途上。鲜有人知的是，当年他带领技术团队积累了十余年的无人驾驶技术，却由于缺少资金，无法转化。关键时刻，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为其团队提供将技术推向市场的平台和启动资金，以及超过70%的股权激励。1年多时间，中科智驰就实现了从技术成果到量产盈利。像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这样的协同创新平台，合肥与大学大院大所大企累计共建了30个。以平台创新为支点，合肥形成了高效运转的科创产业“加速器”。

数据无言，却振奋人心。2021年合肥平均每天诞生3.4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截至2022年1月24日，合肥市A股上市公司69家，居省会城市第7；其中科创板上市公司13家，居省会城市第2、全国城市第6。在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城市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合肥位居全国城市第14、省会城市第6。合肥高新区在169家国家级高新区中综合排名升至第8，合肥经开区在217家国家级经开区中综合排名跃居第10。

如今的合肥，以芯片、平板显示、装备制造及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地标产业加速壮大，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政策链、资金链深度融合，各类市场主体“万类霜天竞自由”。

以体制创新激发创造活力。科学研究尤其是

基础研究具有周期长、难度大等特点，如何激励科研人员在基础研究领域长期攻关？很多科研人员感触最深的是，合肥这块地——土好，肥好，能出活儿。

张斗国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教授。中国科大浓厚的学术氛围，合肥市良好的科研支持政策，让他在光学领域已经潜心研究了十余年，取得了丰硕成果。合肥市实施科研经费包干制，对科研经费使用充分放权，让科研人员自主管理经费，不仅提高了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而且调动了科研人员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发展的新引擎，那么体制改革就是点燃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为最大程度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合肥在全国较早开展国家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等措施；采用多种投入方式支持各类主体创新创业；成立市委科技创新委员会，出台科技创新条例，组建科创集团……以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

“昨天的合肥靠创新起家，今天的合肥更要靠创新当家。我们既要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继续一路飞奔，也要在机制创新和方法创新上取得更大突破。”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说，要在全市形成人人讲创新、处处讲创新、事事讲创新的浓厚氛围。

合肥这片创新创业的沃土，正在成为各方英才生梦之地、筑梦之家、圆梦之城。

（作者：梁佩韵、张春林；来源：《求是》2022 年第 5 期）

这个“国际一流”的研究院，为什么选择合肥？

“震撼”“有气魄”“站位高”“有战略性、前瞻性”，20 多位院士专家为何同时发出这样的感慨？装备“空芯化”问题严重，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一流环境研究院建设刻不容缓！

“今天让大家看到一个‘科里科气’的合肥，对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他们为何这样说？这要从 20 多位院士专家参加的一场论证会说起。

为什么在合肥？

3 个维度，4 个要素，5 个中心，10 多位院士担任首席科学家，合肥正在谋划一个大动作！

3 月 19 日，20 多位院士专家线上线下齐聚合肥，为组建一个“国际一流”的研究院把脉问诊。

这个“国际一流”缘何建在合肥？其背后是多重优势的叠加。

“十三五”以来，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持续加大，国内环保产业市场空间加速释放，环保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发展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是培育发展新动能、提升绿色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更成为推进碳达峰、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一环。

2017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批复设立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聚焦信息、能源、健康、环境四大领域。2021 年 9 月，中国科学院与安徽省政府签署新一轮全面合作协议，共同推进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环境研究院建设。

为什么选择合肥？

首先，在政策方面。从 2020 年开始，国家推动“双碳”发展，绿色环保产业迎来最大“风口”，乘上了国家的“大势”。安徽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将“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列为十大新兴产业之一。

合肥在 2020 年将节能环保产业作为合肥市十二个重点产业之一，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发展，大力实施产业集聚发展工程、技术产品推广工程、碳排放达峰行动工程，加快形成一批重大战略技术，从源头加大减排减碳力度。同时，形成配套齐全、特色鲜明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到 2025 年，培养节能环保产业成为合肥市主要经济增长点之一。

其次，在平台方面。作为“十三五”以来全国首批、全省唯一晋级国家级的经济开发区，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乘势而上，聚集了 27 个国家和省级环境领域科研平台，其中，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在大气环境监测技术方面经国际评估认为已跻身国际领先行列，成为产业发展的孵化器和加速器。

近年来，合肥持续发力，积极布局五大产业聚集区，形成中国声谷、中国网谷、中国安全谷、中国环境谷等合肥版“五谷丰登”。其中，合肥蜀山区打造以“中国环境谷”为代表的产业集群，形成“环保技术研发——核心基础零部件生产——环保装备

制造——环境治理、环保工程及环保服务”全产业链条，成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金字招牌”。

同时，产业力量雄厚。安徽节能环保产业规模近 2000 亿元，占全国近 10%，涌现出国祯环保、海螺环保、艾可蓝等 14 家上市企业。在合肥，环保产业年均增速 9.7%，产业规模突破 700 亿，一批全国知名企业相继落户，计划打造两千亿级产业集群，只用 5 年时间，合肥打通了一条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新脉络。

最后，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关键。合肥集中了安徽 70%的科教资源，拥有高等院校 60 余所、各类研发机构超 1500 家，聚集各类人才 190 多万人。仅合肥市蜀山区，就汇集了 10 万多名科教人才和高校师生，占总人口比例为全省最高，成为“科创安徽”首批试点城区，并有院士、国家“杰青”等 100 余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文清作为学术带头人，参与建成了大气环境污染监测先进技术与装备国家工程实验室，作为我国大气环境监测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工程实验室，凝聚了一支专业结构合理，以中青年博士为骨干的科研团队。

2020 年 9 月，《自然》杂志发布“自然指数—科研城市 2020”排名，合肥跻身 20 强，评价道“非一线城市，有着一流的科研”。

合肥市长罗云峰表示，“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方兴未艾，产业创新优势日益显著，合肥探索开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融合的‘新赛道’，积极抢占节能环保产业蓬勃发展的‘新风口’，将一如既往为科学研究提供优良的创新环境，为科研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奋力开创合肥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路子。”

环境科学与环保产业创新，正从合肥起势！

建设什么样的“一流”？

在合肥，开辟一条“绿色”新路径，怎样才能提升“含绿量”？

从“治污降碳”的实际出发，环境研究院不仅肩负着成为学界、业界标准制定引领者的使命，更将成为合肥科技创新的一张城市“新名片”。

“今天的汇报让大家看到一个‘科里科气’的合肥，对研究院的未来，我们充满信心！”院士们纷纷“点赞”。

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环境研究院实施方案专家论证会上，19 位两院院士和 2 位国家大科学装置工程咨询专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听取环境研究院实施方案报告并逐项进行论证。

“环境领域关键技术和成套装备依赖进口，国产化不足”、“装备‘空芯化’问题严重，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闭环体系技术支撑比较薄弱，‘可靠性’不足”……专家指出，面对“减污降碳”的新形势和新的战略需求，一流环境研究院的建设刻不容缓。

决策融媒体记者从现场获悉，环境研究院将设在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国环境谷”内，以“孕育原始科技创新、突破战略前沿技术、培育新兴环境产业”为主线，创建国家级创新平台，形成国家环境产业创新源头、关键装备来源中心，打造国家级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引领环境产业跨越式发展。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科学中心处副处长于伟表示，环境研究院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是环境领域的一个高端新型研发机构，“是集聚高层次人才，打造环境领域高端人才集聚地，一体化开展原始创新基础攻关以及成果转化，助力环境产业千亿级集群的形成。”

环境研究院正式获批成立后，必将推动更多环境产业企业集聚，为整个“中国环境谷”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争取 2025 年突破千亿产值，合肥市蜀山区委常委卢磊介绍说。

“震撼”“有气魄”“站位高”“感到振奋”“全面”“具有战略性、前瞻性”，是在场院士专家对环境研究院定位和未来发展反复提到的几个关键词。他们认为，环境研究院不仅要立足合肥、放眼全国，更要辐射世界。

根据方案，环境研究院将初步形成技术创新、示范应用、产业发展的完整工程科技创新体系，逐步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综合性技术研发和创新基地，国家一流的环境高新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和国家一流的新型环境产业创新发展基地。

正如合肥市蜀山区委书记王海霞在 PPT 中提出的：“全力打造‘中国环境谷’，探索出一条地方政府与科研院所携手促进科技成果就地交易、就地转化、就地应用的新路径。”

合肥，正努力在节能环保产业成为标杆！

怎样建成“一流”？

作为中科院“携手”安徽省建设的国际一流研

究院，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环境研究院将如何建设？

在总体布局方面，研究院将按照“1+N”的总体思路进行实体化建设，即 1 个院本部，“N”个联合应用示范中心。院本部中除支撑部门外，将重点建设 5 个技术中心：湖泊与水环境污染控制中心、大气污染与温室气体控制中心、土壤与固废污染控制中心、天基载荷技术与应用中心和环境监测技术与装备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 5 个中心，研究院聘请了 10 余位不同研究方向的战略首席科学家，深化学科发展和项目布局，这些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可谓“阵容强大”！

怎样用技术推动产业发展是研究院建设的关键之一。刘文清院士在现场用“3 个维度”的坐标图，展示了研究院的整体谋划：工程技术研发、技术示范应用、产业创新发展，即以技术创新和关键技术的突破为基础，解决高技术成果到实用化产品之间存在的工程技术问题；并用“4 个要素”：监测、评价、预测、治理，解释了环境高技术体系如何运行。

“汇聚人才”，是在场院士专家达成的共识。一方面，研究院坚持人才优先，积极探索机制体制创新，设立院长基金，注重关键人才引进，管理模式上实行学术带头人制；同时，提出“先定事、后定人”的发展模式，以事定人、先事后人，示范中心成熟一个，部署一个。王海霞表示，“合肥蜀山区将为高层次人才提供高水平服务和高品质生活。”

“重点突破”，是达成的另一个共识。环境研究院实施方案科学性、系统性地全面涵盖了环境保护的各个方面，院士们建议，研究院未来可以重点聚焦某些领域，精准发力，实现突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如何将“绿水青山”的自然价值和生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据悉，环境研究院将分阶段建设。

根据规划，2025 年前，将建成国内一流的环境科技新型研发机构，争创国家级创新平台，推动安徽省环保产业发展水平快速提升，成为全国环境领域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

2025 年至 2030 年，将产生多项国际领先的原始创新成果，初步形成国家生态环境科技产业创新源头、重大关键装备来源中心，形成国家级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引领国家环境产业跨越式发展。“希望环境研究院在‘开头之势’，就起到在我国环保领域具有借鉴和示范意义的作用。”论证会现场这样总结。

乘势而上！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融合的“新跑道”上，合肥将借力绿色低碳这股“势”，提高经济发展的“含绿量”，为环境科技和环保产业同频共振贡献“合肥力量”！

（来源：决策网，2022 年 3 月）

安徽合肥：人工智能产业声名远扬

“人工智能将影响未来 10 年到 20 年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机遇，也是挑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表示，“创新真正的核心在于掌握价值链的主导权，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楼房建在别人的院子里面。”

集群建设风“声”水起

“你看这几台机器，像不像人的眼睛、耳朵、鼻子，这是我们的电力‘全科医生’，掌握望闻问切四大技能。”在位于中国声谷的合肥中科类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展厅，该公司董事长刘海峰介绍说，机器通过带 AI 芯片的视觉系统能“看”清变电站周围的状态；变电站出现异常过热会释放有害气体，机器能非常灵敏地“闻”到这些有害气体；还可以通过“听”机器运行发出的声音，判断其运行效率、状态。再加上类脑边缘盒子，可以对所有的状态信息进行实时处理。

在合肥，说起“人工智能”就会让人想到城市的新地标——中国声谷。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级 AI 重要产业基地，中国声谷已先后获得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国家特色服务出口基地等 11 项“国字号”荣誉，形成了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021 年，合肥人工智能集群集聚企业达 846 家，同比增长 23.2%；全年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 815 亿元，增速约 21.1%，其中智能语音产业规模突破 185 亿元，占全国该产业总产值的 64.9%。

“我们构建了从底层硬件、数据计算、基础应用技术到智能终端及行业应用的全产业生态体系，语义、图像、算法等技术板块竞相发展，物联网、大数据、智能硬件、高端制造+服务等产业生态日益完善。”中国声谷高级运营副总裁毛媛媛说。

毛媛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中国声谷的人工智能智慧教育产品服务于全国32个省5万所学校超1亿师生；智医助理已在安徽、江苏、浙江等26个省市开展实际应用，同时覆盖全国200余家三级医院。科大讯飞承建的7×24小时不打烊“随时办”服务的智慧政务模式获各方肯定。

生态营造有声有色

“人工智能时代充满机遇与挑战，也容得下千帆竞发。”刘庆峰说，为了让人工智能惠及更多人，早在2010年，科大讯飞就在业界率先发布了讯飞开放平台，全面开放业界领先的核心技术，为软硬件开发者降低集成门槛，为企业提供行业解决方案，支持开发者创业。

“我们做了一个测试，当场让4个开发者用这个平台来开发应用，晚上7点半开始，8点半就要现场展示成果。原来开发软件可能需要几个月，后来变成几周，现在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这就使得开发者的效率极大地提升、成本也就相应降低。”刘庆峰说。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单点的技术创新已经不足以解决重大社会问题，人工智能要解决重大社会命题，必须构建人机协作、自我进化的复杂智能系统。“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包括关键的场景、需求、资源、教研以及管理模式在内的‘一盘棋’，要用系统性创新真正解决整个社会重大问题。”刘庆峰说。

“我们将‘低代码’和‘零代码’提供给各行各业开发者，使得各个领域的开发者可以直接在行业基线底座的基础上，解决一个又一个行业关键问题。”刘庆峰表示，让千千万万的创业英雄们加入到系统性创新的舞台中来，人工智能才能够解决诸多社会刚需问题。

目前，讯飞开放平台已设置了18个主要赛道，包含教育、医疗、智慧城市、农业、环保、汽车、酒类、旅游等，每条赛道都有上千个团队在做创新应用，科大讯飞提供包含标准体系、测试平台、认证体系、培训平台、低代码开发平台、开发者大赛等保障。“只有生态的繁荣，才会让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全球竞争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刘庆峰说。

除讯飞开放平台外，中国声谷的类脑智能开放平台已向万名开发者提供17.25P FLOPS算力和7.91PB存储，汇聚180项全球领先的工程算法及150项高价值数据集，数据规模达300TB。以龙头企业为中心，各方要素为支撑，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正在加速构建。

协同创新先声夺人

2021年4月，中国声谷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启动“四院一谷”战略合作，充分利用各自在人才、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促进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

前不久，科大讯飞在机器学习预防和防止流行病全球挑战赛、自动驾驶、多语言理解等国际大赛中荣获7项世界冠军，一项研究成果荣获中国智能科学技术最高奖“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语音识别方法及系统》发明专利获“中国专利金奖”，实现了安徽省5年来该奖项零的突破。

此外，安徽推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肺部辅助诊断系统在意大利、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多家医院投入使用，成为首个拥有国内外四大市场认证的AI医疗公司。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首次实现对猕猴全脑的微米级分辨率三维解析，使灵长类脑图谱绘制成为可能。

目前，中国声谷聚集了语音及语言信息处理国家工程实验室、类脑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农业物联网技术集成与应用重点实验室、过程优化与智能决策重点实验室及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等为代表的省级以上创新平台70家。

（作者：吴长峰；来源：《科技日报》2022年3月）

推动智慧医养结合养老模式高质量发展

——以安徽省合肥市为例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现阶段我

国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居家养老、自我养老、社会养老等传统养老模式也随之转型发展，以“医疗+养老”为代表的智慧养老服务模式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

作为国家公布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试点的第二批城市——安徽省合肥市，在推进养老模式转型发展中取得进展。但是，在服务端、内容端、供求端、主体端还不完善，需要从政策组合、技术赋能、人才吸引、平台建设方面采取合理对策，以期促进智慧医养结合养老新生态更好发展。

智慧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面临新发展

从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到如今的智慧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服务对象是需要照护的老年群体，但服务方式从信息化转向智能化，服务内容从“医疗+养老”的二维服务转向“智慧医疗+养老+平台”的三维服务体系，服务质量开始从低层次的需求满足转向高质量的多样化需求，智慧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是结合“智慧养老”“智慧医疗”和“医养结合”三种服务理念，打造的是符合智慧政府和智慧城市理念的现代化智慧养老服务体系。

服务升级，智慧医养是传统养老模式的升级版。智慧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是传统养老模式的 3.0 模式，促进了养老服务模式的创造性升级。传统养老模式是应对老龄化发展的初级 1.0 版本，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是继传统养老模式发展、满足医疗需求的养老模式的中级 2.0 版本，而智慧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则是在结合了前两种版本的基础上，回应养老模式更新的高级 3.0 版本，从智慧医养结合主体间的关系来看，智慧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是包涵智慧家居、智慧社区、智慧机构、智慧政府、智慧医疗五位一体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从智慧医养结合模式的内容来看，这是包涵“医疗、养老、康复、护理、服务、管理、评价”为一体的智慧型养老模式。

技术赋能，智慧医养智能化趋势明显。智慧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以信息技术发展为基础，技术赋能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在技术层面，技术的发展建构了智慧医养结合的养老平台，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结合线上线下互动模式，然后对智能终端设备收集和处理数据，调动和整合区域医疗和服务资源，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从而实现老年人、家庭、机构和社会的资源整合。另外，技术固然赋能养老模式的创新，智慧医养结合不仅注重技术在养老产业的应用，还体现出模式的融合性和服务的人性化，利用智慧技术和手段，将技术应用到老年人生活中，完善老年人医疗电子档案，实现线上挂号、问诊，线下服务的模式，实现智慧城市、智慧社区与智慧医养结合的多向联动。

内容贴合，智慧医养是医、养、网的紧密结合。智慧医养结合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实现可操作化，以根据老年人身体需要而随时灵活转化“医”和“养”两种模式，加强了服务质量，提高了服务水平。通过建立数据库实现医疗、养老与互联网的链接，个人信息系统、个人健康数据系统和个人需求系统共同构成智慧医养结合的数据库。个人信息系统是个人的基本电子档案，健康系统则是根据个人的身体素质评估得到的一系列可视化指标，需求系统则是个人根据自身需要为老年人提供线上线下的服务。智慧养老模式体现了对于信息的整合与集成，展现了人性化、智能化、服务多维化的包容性养老模式。

合肥市智慧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建设存在的问题

合肥市智慧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从服务内容来看主要有“医转养”和“养转医”两种医养方式。从传统的养老模式到如今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是养老服务精准化、养老服务多样化、养老服务智能化趋势的体现，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将结合大数据以及互联网技术，精确追踪老年人不同需求展开服务，调动现有资源促进老年人治病、养老的便利化和信息化。在调研中发现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在服务端，服务费用和评估等级差异明显。在调查研究中，老年人关于入住条件没有明确的严格限制，在入住前进行体检确定老年人没有感染性疾病和精神性疾病的情况下都可以自行入住，但是没有身份的严格限制并不代表入住费用的均等化。当老年人办理入住时，养老机构根据民政部制定的评估标准分成不同的护理等级，最常见的护理等级是分成自理、部分自理，半失能和失能，根据护理等级确定入住费用的标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性，但由于评估能力操作性的软规则、评估标准的即时性还存在差异，可能会把半自理状态划入到半失能的等级，或者随定期检查护理等级会频繁变动，导致老年人每过半年或一年

时间频繁更换护理等级，而护理等级和需求的变化是导致费用提升的主要原因。

第二，在供求端，供求不平衡，床位利用率低下。通过走访调研，我们发现一种普遍的情况，一方面，现在医养结合试点的养老院所做的都是高级养老院，对于缴纳的费用较高，入住的老人大多都是退休的高职干部或家庭条件较好的老人；另一方面，医保统筹层次较低，封顶线的报销限制了老年人的就医范围，碎片化医保制度阻碍了医疗资源和智慧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的共享。此外，老年人若突发意外需要重新检查或者聘用护工，费用额外支付，因此，大多数老年人并不能享受到符合自己预期的养老服务，高昂的养老费用使得老年人医养结合养老的愿望可望而不可及。

第三，在内容端，“医”与“养”的曲线结合。智慧“医”与“养”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将养老与就诊相结合，而是在简单的模式基础上利用智慧医疗的技术对老年人的需求和服务进行评估，从而有针对性地为老人制定健康的养护策略。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智慧“医”与“养”结合只是表象，在机构内部，内设的医疗机构专业水平低，医疗护理质量低，智慧养老产品开发不足现象普遍存在，而真正能够做到智慧医养一体化，医养联动性比较强，只有医院能够覆盖。养老机构的适应能力弱、创新需求不强、养老品牌分散化抑制了养老机构内部智慧医养结合进程。

第四，在主体端，多主体参与衔接机制松散。智慧医养结合的发展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力量的支持，理想化的状态是政府政策支持，企业资金帮扶，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良性循环的价值链条需要多主体紧密协作。智慧医养结合的市场潜力没有充分发挥、企业和机构合作碎片化、政府与企业参与的表象化，限制了智慧医疗和智慧养老的深入融合，特别是企业认为养老机构并不是长期合作的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而是提供捐赠和宣扬企业价值理念的重要工具，单纯的物资捐助限制了养老机构与市场的贴合度。除此之外，各参与主体在参与智慧“医养结合”合作中必然产生利益冲突问题。

第五，在人才端，专业医护人员吸纳性较低。安徽静安养亲苑是目前安徽省投资最大、服务品质最高的高端老年养护机构之一，本着“与长辈携手共创幸福生活”的服务宗旨，开创社会精英老年生活方式，集老年健康管理、医疗康复、保健养生、心理咨询、文化娱乐、餐饮服务为一体，践行“亲情养老，科学养老，环境养老，文化养老”的服务理念。以静安养亲苑为例，智慧医养结合模式中的医护人员类型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业医生，另一类则是护理型医疗人员，负责养亲苑的老人的日常护理。由于养老院没有资格注册各类医生所需要的证件，因此与养老院合作的医院医生兼任养老院医疗工作，或者养老院单独聘医生，医护人员仍属于医院编制，医院和养老院签订协议，各付医护人员一半薪酬，医生队伍人数少、专业面窄、设备残缺的情况置智慧医养结合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将滨湖医院与静安养亲苑对比，医院中的专业人才队伍更健全，能够为老年人提供全面的看诊、理疗、保健服务，而养老机构里面更多的是常规护理。另外，机构中缺乏较高层次的护理人员，没有相关的医疗资质，导致一些优秀护理员人才流失，影响了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推动智慧医养结合养老模式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通过对合肥市智慧医养的调查研究发现，智慧医养的快速发展要依托政府政策支持、信息技术赋能、多主体协同发展、完善医养平台、健全人才机制等措施高位推动智慧医养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人民幸福的养老发展新业态。其中，在服务、供求、内容、主体、人才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制约合肥市智慧医养高质量发展的因素。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健全政策，加强智慧医养结合养老体系建设。智慧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涉及政府、社会和个人，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社会治理的主体，政府在智慧医养结合养老模式中也发挥着整合和主导作用。第一，智慧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涉及范围广、关联部门多，政府政策的出台需要加强与多个部门的衔接，加强政策的叠加功能，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推动政策优惠的普惠性，为智慧医养结合提供政策保障。第二，制定和考核智慧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规则和标准是政府职责所在，政府需要从整体性角度出发，定期展开评估工作，创建精准的资源分配机制，助力智慧医养结合形成一个具有示范效应的服务规划和供应链条。

技术赋能，促进智慧医养的深度融合。技术发展是智慧医养结合服务模式创新的关键引擎，特

别是在智慧养老的发展背景下，充分利用技术的便利性，开发养老智能设施，背后都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撑。通过微信、网络、App 等直接预订，促进“医”+“养”+“网”的深度融合，完善智慧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建设，保护老年人及其家属隐私是行业操守，依靠人脸识别、权限管理、数据备份等技术手段保证医养信息安全。技术手段的更新催化服务方式的更新，智能终端设备数据的统计和预测，可以对老年人日常生活和需求进行实时动态监测，智慧医养结合服务中，网上问诊、家庭医生等，简化预约诊治、配药、复查等一系列的过程，打破了看病周期长、看病难的问题，提高了综合服务质量，促进了智慧医养的深度结合。

多元协同，发挥医院与养老机构主体积极性。由于智慧养老服务的市场属性和碎片化现状，政府和市场结合能够推动智慧养老事业的健康发展，医院与养老机构是智慧医养结合中的主体，在完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上，充分发挥各种一、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专业优势，鼓励和支持传统型养老转型为医养结合养老，让老年护理院、临终关怀医院等对病患老人提供专业的医疗照顾，并将一些实力雄厚的养老机构和二甲以上的医院合作，按照医疗机构设置的标准和规划进行整顿和改造，通过民政部、卫健委进行审核，形成高质量的养老机构。

建设平台，完善智慧医养结合服务平台建设。智慧医养结合是结合线上与线下服务模式，通过云平台与服务主体、服务对象、服务方式对接，智慧医养云平台以移动互联网产品使用为载体，能够集约资源满足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整合小区、医院、养老机构功能，建设“医”“养”“护”的多方位转换，特别是老年人子女和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远程操作，预定服务与评价。智慧医养云平台的建设还可以提供更多选择机会，智慧医养结合现在呈现出智慧居家养老、智慧社区养老和智慧机构养老等，通过智慧养老云平台建设，保障日常终端移动设备数据传送正常，覆盖项目的多样化、服务的精准化，获得了独居老人和失能老人的青睐。完善智慧养老平台建设是推动智慧养老模式发展的重要途径。

人才吸纳，培训多层次专业护理人才。人才是发展的不竭动力。目前，不论是医疗行业还是养老行业都存在人才短缺的现象。智慧养老服务模式下，技术赋能智慧医养结合还体现在对于医护人员的培训和建设，养老护理行业普遍存在工资低、待遇差、地位低的问题，导致人员流动性较大，队伍稳定性较低。因此，充分利用高校、各卫校中的老年护理专业或专门建设护理学校，并利用智能设备培养高素质护理人员，提高护理专业性和稀缺性，从而建立起完备的护理队伍，为智慧医养的纵向发展提供思路。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方式，放开政府对机构的传统管理，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在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政府给予补贴和帮助，通过市场与政府双管齐下，可以更好地打造人才队伍，更好地服务社会。

（作者：刘亚南；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22 年第 2 期）

长三角中心城区探索区域合作“创新样本”

长江，漱冰濯雪，一路奔涌，在东部的三角洲地区孕育出万千气象。这里月纳税额逾亿元的高楼大厦数以千计，这里日客流量超百万人次的商业街区闻名遐迩，这里拥有最宝贵的流量资源和最具有竞争力的高端服务业……

长三角主要城市中心城区高质量发展联盟（以下简称“长三角中心城区联盟”）以不足 3%的所在城市面积，贡献了 10%以上的所在城市经济产出，GDP 总量超过 1.6 万亿元，联盟第三产业比重达到 80%以上。

“长三角中心城区联盟，是第一个由长三角区级政府层面牵头组建的合作共同体，是第一个以非毗邻地区为主体、以经济形态结构为主导的发展联盟，也是第一个以高能级中心城区联合为依托、立足于高质量发展的合作共同体。”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杲云介绍说，2021 年，上海市黄浦区牵头组建了长三角主要城市中心城区高质量发展联盟，联盟成员包括上海市黄浦区，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苏州市姑苏区、无锡市梁溪区、南通市崇川区，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宁波市鄞州区，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合肥市蜀山区 9 个中心城区，覆盖长三角所有万亿级 GDP 城市。根据《长三角主要城市中心城区高质量发展联盟战略合作协议》，联盟将围绕长三角“一极三区一高地”战略定位，

充分发挥各中心城区功能引领、资源集聚等优势，共同推进经济领域、科技创新、政府管理、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合作，联合制定实施联盟行动方案，推进 5 大方面 20 个领域 43 项合作任务，推动资源共享、合作共建、优势互补，实现中心城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城市的中心城区的高质量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长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但是中心城区同时也面临着城市更新、产业升级等发展共性问题，需要共同探索、协同共进。”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华源说，长三角中心城区联盟是长三角城市合作又一个全新的探索，对于中心城区深化区域合作、发挥辐射引领作用、深度参与服务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商业联动激发消费新活力

百年传承老字号是长三角城市群共同的文化记忆，如何让老字号焕发新活力？

去年 11 月，上海市黄浦区和无锡市梁溪区等在无锡共同举办了“百年传承?精彩扬帆”——“长三角老字号进校园”暨长三角老字号品牌联盟启动仪式，直播介绍黄浦区老字号新品，发布了五大振兴老字号品牌行动，助力长三角老字号企业深化合作、品牌做大做强。此外，长三角中心城区联盟将于 2022 年开展“老字号新活力”专项行动，在联盟成员区核心商圈开展老字号联展巡展，让长三角的老字号流动起来，焕发新活力。目前，联盟成员合肥市庐阳区正在筹备开展长三角老字号大走访，携手合肥重点老字号企业，走进上海黄浦、苏州姑苏、杭州上城等地，学习交流长三角著名老字号守正创新的方法经验，推动区域老字号共同创新发展。

除了知名老字号云集，联盟九区享誉国际和国内的购物好去处不胜枚举，拥有南京路步行街、新街口商圈、湖滨商圈、观前街等知名商圈。今年，联盟九区将聚焦扩内需促消费，联动开展中心城区购物节，加强跨域商圈联动，共同建设品质消费城区。同时，联盟正在积极推进“满意消费长三角”建设，推动区域内有影响力的企业率先参与创建“长三角异地异店无理由退换货单位”，开展异地异店退换货，推行消费纠纷“异地受理”，为消费者提供更加高品质的消费服务，携手打造更加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

楼宇升级打造发展强动力

长三角地区是楼宇经济发轫最早和发展最成熟的区域之一，以楼宇经济、总部经济为重点形成的高端产业集群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联盟 2021 年税收亿元楼宇数据约 200 栋，以高标准推动楼宇能级提升、以楼宇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经济更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长三角中心城区联盟成员的共识。高标准，需要充分体现楼宇经济对区域经济拉动、城市品位提升、城市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综合效益，体现楼宇对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人文生态打造等方面的促进作用。

“我们希望联盟成员共同研究编制一个能够衡量楼宇经济发展水平、体现商务楼宇综合品质的长三角商务楼宇等级评定标准，推动成员间楼宇经济资源共享、经验互荐、产业相融，进而推动区域间资源要素自由流动、营商环境整体优化，以长三角楼宇标准的一体化服务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增添更多动力。”上海市黄浦区、杭州市上城区相关负责人共同表示。在楼宇经济改革发展领域，中心城区一直走在长三角前列，在大量实地调研基础上，上城区于 2020 年 4 月首推《楼宇平方效益评价规范》杭州市地方标准，设置了党群建设、经济效益、硬件设施、绿色环保、智能管理、营商环境等 6 个维度 39 项细化指标，并依据标准启动首次商务楼宇等级评定。在此标准指引下，部分楼宇开始转变招商思路，聚焦提升产业层级和发展能级。如今，随着楼宇经济纳入联盟的合作项目，楼宇标准得以在长三角更大范围内得到实践推广。

通过在联盟层面明确长三角商务楼宇等级评定标准，分阶段开展商务楼宇等级评定，推动开展楼宇等级评定实践，不断推动楼宇服务、产出能级提升，建立扩大楼宇经济合作发展“朋友圈”，共同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合肥市蜀山区等相关负责人表示，联盟为长三角中心区跨域联动、深度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十四五”期间，要积极发挥中心区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功能优势，以联盟为重要依托，不断拓宽长三角城区合作边际、加大合作深度、展现合作成效，携手探索中心城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径。

城市更新提升区域软实力

漫步在上海南昌路，步履从东向西，历史遗址

遗迹举目可及,街道两边,底楼店铺林立,橱窗多姿多彩,老建筑与绿色交汇,烟火气与艺术交融,尽显海派街区的精致典雅。

镜头向北,穿行于苏州古城的寻常巷陌,清雅宜人的院中花园、贴心便利的“24小时共享空间”、沉浸式的线上全域有声导览,姑苏区32号街坊在2500年的历史中绽放出现代化的活力生机。镜头往南,漫步西湖,苏堤春晓、断桥残雪、柳浪闻莺……每处景点都美如画卷,令人如痴如醉,承载着老杭州人记忆的大湖滨商圈,在这座历史悠久而又生机焕发的城市中快速生长。

如果说文化是城市的根,那么历史文化街区就如同这座城市的族谱,每一个角落都写满了人们的集体记忆。在城市更新中,历史文化街区如何焕新?又如何从物质更新转化为产业、文化、社会的内容更新?

黄浦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区,见证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是上海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拥有许多独一无二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源。作为上海历史文化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黄浦区历史风貌保护区约占全市风貌保护街坊数量的1/3。

“黄浦区各类风貌保护区(街巷)要占到整个区域面积41%,基本上每一个街区都有历史建筑或者风貌保护的要求,城市更新并不是简单的推倒重来,这也是黄浦旧区改造的压力和难度所在。”杲云介绍说,“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也是上海12个风貌区当中唯一一个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区域内有177栋楼都是1949年之前的历史建筑。为最大限度保护空间肌理格局,更好地保留城市记忆、焕发城市活力,黄浦区一直高度重视城市更新,并借用社会力量、多策并举地来推动历史文化街区高质量迭代活化。”

长三角中心城区联盟要聚焦城区发展中的共性问题,加强模式的创新探索形成打造高品质城区的合力。2021年,联盟各区在城市更新和历史建筑保护领域达成合作,建立完成“一个群组、一项方案、一次签约、一份协议”,即组建一个工作群,形成联络顺畅、沟通及时的高效合作保障机制;制定一项联盟城市更新和历史建筑保护领域工作方案;开展一次重点领域合作项目签约;形成一份《长三角主要城市中心城区高质量发展联盟城市更新和历史建筑保护领域合作协议》。

未来,依托联盟全新平台,中心城区将充分发挥“领头雁矩阵”的领飞示范作用,积极推动优势领域开展务实合作,进一步提升城区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增强非毗邻区域的协同效应,为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交出一份中心城区的优异答卷。

(作者:邱爱荃;来源:《中国经济导报》2022年3月)

2021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发布:一体化创新格局基本形成

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成效如何?未来还有哪些发力点?2022年1月,江苏省科技情报研究所(江苏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安徽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安徽省科技档案馆)共同发布《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2021》,这也是三省一市4家科技智库第三次共同发布该指数报告。

指数研究以提升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策源力、支撑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为评价对象,构建了包括资源共享、创新合作、成果共用、产业联动和环境支撑5项一级指标以及20项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研究以2011年为基期,测算评估了2011–2020年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得分情况。

报告显示,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从2011年的100分(基期)增长至2020年的227.05分,较2011年翻一番,同比增长9.69%,年均增速达到9.54%,长三角整体协同创新水平稳步提升,一体化创新格局基本形成。从5项一级指标变化情况来看,成果共用指标增幅最大,从2011年的100分提高到2020年的292.15分,年均增速达到12.65%;其次是资源共享指标,从2011年的100分上升到2020年的246.32分,年均增速达到10.54%;第三是创新合作指标,从2011年的100分增长到2020年的224.81分,年均增速达到9.42%。相对而言,产业联动和环境支撑两个指标发展增速较为滞缓,是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未来发展中需要关注的重点所在。

报告反映,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已形成三大高地。其一是创新资源集聚和流动高地。2020年,长三角地区每万人拥有研发人员占67.97人

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近3倍,高被引科学家达到237人次,占据全国的27%,从人才流动的视角来看,“十三五”期间,科技人才在长三角三省一市跨区域流动达到165万人次。2020年,长三角地区研发投入强度高达2.8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近三成,长三角地区财政科技拨款占政府支出的比重为4.8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两成。创新资源高浓度集聚、基础设施高能级建设为长三角协同创新提供了重要条件,尤其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和创新券通用通兑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随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布局和推进,三省一市之间重大技术联合攻关活动日益活跃,长三角打造高水平协同创新策源地的进程不断加速。

二是创新成果开发和共享高地。2020年,长三角区域国际科技论文合作数量持续增长,从2011年的3817篇上升至2020年的22575篇,10年间增长近5倍。同时,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以上城市全部参与到科技论文合作网络中,以科技论文为纽带的长三角区域科研合作网络实现全覆盖。2020年长三角专利转移数量达到17741件,合作发明专利3010件,相比2011年分别增长了16倍和6倍,增速明显。随着长三角区域园区共建、研发飞地、离岸科技创新中心等一批创新平台的建设和发展,创新成果合作开发和有效共享机制更加完善,源源不断地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三是产业发展联动和投资高地。2020年,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利润高达2885.6亿元比2011年的1559.2亿元接近翻番,占全国高技术产业利润的十分之三左右。截至2021年9月,长三角地区1456家上市企业在长三角异地投资企业近4000家,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上市企业在长三角跨区域投资企业数量分别为1209、1024、1358和364家。截至2021年9月,长三角地区获融资企业数超过1.3万家,其中,上海获融资企业超过6000家,占长三角地区的一半,浙江和江苏获融资企业数量相当,分别为3405家和2875家;在资金流动方面,上海是各地投资机构开展投资活动的主要地区,浙江、江苏投资机构在上海开展投资活动均占区域内异地投资的71%。总的来说,长三角已经形成促进创新主体和资本要素高效畅通的营商环境和要素市场环境,为将来围绕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来源:国研网 2022年1月)

本栏目供稿、责任编辑:黄宁平

启 事

本栏目属转载文章,因客观原因未及与作者提前沟通,请作者看到本启事后,与本刊编辑部联系(电话:0551-62206629),编辑部将按本刊相关制度向作者支付稿酬。

(上接第46页)

[2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6]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7]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9]种海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政治美学与美好生活的人学逻辑[J].江苏社会科学,2020(5):11-19.

[30]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3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32]习近平.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3-29.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4]杨清涛.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百年探索及经验启示[J].中州学刊,2021(12):1-6.

[35]张廷广.“历史合力论”视域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路径探析[J].科学社会主义,2021(6):90-96.

责任编辑:马俊


图说
我们的
价值观
公益广告
和以處衆寵以接下恕以待人
中戶書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901号
邮政编码：230031
电　　话：（0551）62206658　62206629
电子邮箱：XB1233@126.com

印　　刷：合肥新南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方式：自办发行
定　　价：5.00元

ISSN 1674-5000
03
9 771674 500226